

文化冷戰 ——道德重整運動在香港的發展

陳學然*

世界道德重整運動(MRA)宣揚從自身道德改造做起，進至改造家國天下，把重建一套超越國家、民族、宗教、政治意識形態的普世道德價值奉作終極目標。不過，它是在戰後美國的主導下，伴隨美國勢力所及之處而深入世界各地。東亞的日本、臺灣與香港，均不乏參與者。香港異於前者，參與其中的並非政商領袖。他們是一批從事教育領域的社會名流、1950年代中期留港的原「第三勢力」餘部、大專院校學生。由於港英政府在冷戰時期實施政治中立的社會管治，使 MRA 在港主要推動青少年道德教育與文化交流工作。1960年代後期，冷戰氣氛緩和後，全球 MRA 組織也開始蛻變為一般的民間公益組織。儘管如此，研究 MRA 在戰後香港有限度的活動情況，有助於了解一場席捲全球的運動曾經在香港努力發展的事跡經過。由此，在觀察香港社會歷史形貌與環境特質下，香港的參與者——當中包括了第三勢力分裂後的留港群體，如何及為何參與了這場結合宗教與政治的國際運動。這對於了解冷戰香港民間社會如何與周邊地區、國際組織進行非官方的互動與關係網絡的建立，提供了另類的觀察角度。

關鍵詞：「道德重整運動」、第三勢力、文化冷戰、香港、李毓田、張發奎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世界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 簡稱 MRA, 日本譯作「道德再武裝」), 最早發源自英國牛津大學的靈修團契(The Oxford Group), 是由美國牧師布克曼(Frank Buchman, 1878-1961; 布克曼一名同時在一些文獻中譯作卜克門、卜克滿)於 1921 年在英國發起的宗教及思想方面的改造運動。MRA 的核心理念是宣揚四大「絕對道德標準」——「絕對仁愛」、「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

1934 年 4 月 20 日, 布克曼成為《時代》(TIME)雜誌的封面人物。在世界政局波譎雲詭而人心惶惑之際, 他強調自我突破求變, 呼籲世人要有精神及道德上的自覺; 在歐洲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 給無所憑恃的人帶來盼望, 為時人指示一條樂觀積極與充滿希望的出路。雖然《時代》雜誌對他的宗教主張或生活行為有所保留, 但無阻布克曼主義(Buchmanism)傳播。布克曼吸引了大批歐洲信眾追隨——特別是挪威及丹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MRA 於美國異軍突起。背後原因可能很多。首先, 二戰期間 MRA 便轉往美國發展, 熱切地守護美國國家安全;¹ 其次, 戰後美國把反共定為國策的環球戰略, 與 MRA 一拍即合。自二戰前便以反唯物主義、反共為旗幟的 MRA, 在冷戰年代適逢其時, 在美國社會獲得政治表演舞台。MRA 的四大道德標準在冷戰揭幕以來便受到大眾媒體爭先報導, 被奉為一種超越世間所有宗教、學說與主義的超級意識形態。布克曼有了寬廣的國際舞台, 把 MRA

¹ 有關 MRA 在二戰期間怎樣以鮮明的民族主義結合濃厚的宗教情懷、道德責任感表現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守護, 相關論述可見: *Moral Re-armament, You Can Defend America* (Washington, D. C.: Judd & Detweiler, Inc., 1941).

宣傳作改造世界、拯救世界、打破階級、種族、民族、國界對立的「有效方法」。MRA 的四個「絕對」在布克曼的跟隨者眼中，能對治戰後世界的種種缺陷，更可以為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提供改變世界的思想資源與行事方法，「淨化」世人思想、杜絕共產主義的擴散。

自 1948 年美國掀開冷戰序幕以來，MRA 就被稱為「再造世界的自由意識形態」的思想運動，為美國環球冷戰戰略服務的色彩十分鮮明。² 它隨着美國戰後軍事、政治及經濟勢力的擴張而向全球發展，日本、臺灣及香港同樣可見 MRA 的大量活動足跡。可以說，於香港這個置身東西方文化交匯、並且是最接近中國大陸國門的地方，MRA 在香港的出現乃至發展，幾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MRA 得以在港發展，主要由一群包括原「第三勢力」人士在內的南來軍、政、學群體的響應。在背後提供經費支援的美國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下文簡稱 CIA 或中情局) 人員眼中，第三勢力的政治態度是「既不效忠臺灣，也不聽命於北京的中國人」。³ 美國在香港展開的文化冷戰，讓這些南來社群獲得形形色色的經費資助與交流機會，使逐漸被邊緣的身份、角色與政治理念，獲得了新的發展平台，成員復得在歐美諸地往來交流，得以在香港的民間社會、大專院校開關活動場域。他們透過融會傳統儒家學說與西方政治觀念，將之引進 MRA 宣揚的道德體系，樹立起一種完全異於信奉階級鬥爭與唯物主義的價值觀。不過，在港府政治中立管治原則下，他們不可能高調宣揚政治主張和公開進行政治活動。故第三勢力在香港本土沒有公開的

² 1948 年在美國密歇根州總部舉行的道德重整世界大會，基調演講 (Keynote address) 便彰示 MRA 是場宣揚「再造世界的自由意識形態」(ideology of freedom that will remake the world) 運動。“Gathering hears plea for freedom,” *The New York Times*, 12 September, 1948.

³ 李潔明，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2003)，頁 106。

社會活動，只能透過編輯、出版刊物嘗試明裡暗裡地抗衡共產主義、批判共產中國政權。但是，成員背景複雜而政治目標不一的第三勢力，於 1953 年分裂，成員出走美國、日本與東南亞諸地而在香港走向式微。但它的在港餘部，則繼續藉着 MRA 這個平台活動，不但與美國軍政情治人員保持聯繫，同時也與原初第三勢力所不認同的臺灣政權互有交往。研究第三勢力參與 MRA 的活動，有助於認識這個從中國大陸撤退來港的複雜政治社群在 1950 年代中期以來的社會處境與思想活動。

MRA 在今天的香港，早已偃旗息鼓。在鄰近香港的日本及臺灣，MRA 目前仍在營運。從所接觸到的資料顯示，它們已轉型為慈善機構與民間公益團體的非政府組織，彼此都十分努力推動青少年文化交流與才能發展的工作。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們與現時社會政治沒有太多的關連。⁴

回到冷戰時代，不論是對 MRA 思想本質的探討，還是觀察它在香港這個既接通世界的自由開放城市，但又各種政治夾縫中尋求出路的地方的興衰，將可為我們提供另一個視角觀察戰後美國在香港的文化冷戰，認識冷戰香港的複雜政治面貌與人文活動圖景，同時也藉此看到香港的歷史變動脈絡如何受到中美關係變化所影響。

二、美國的文化冷戰與道德重整運動的興起

(一) 文化冷戰：「爭取人心」的意識形態之戰

⁴ Moral Re-Armament (MRA) 於 1990 年代改名為 New initiatives，2001 年再改名為現時的 the new name Initiatives of Change (iofC) 見：*Initiatives of Change*, <https://iofc.org/en>, Accessed June 14, 2022。

美國的文化冷戰，是在與蘇聯原子彈互相震懾的軍備競賽以外的另一種鬥爭方式，是以相對和平的手段爭取人心向背。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抗衡共產主義籠罩東歐、並大舉向西歐擴散的情景下，匆忙作出反應，急起直追地在全球掀起以文化宣傳為武器的冷戰行動。有別於真槍實彈攻守的熱戰，冷戰是兵不血刃的「心理戰」(psychological contest)。心理戰是透過文化領域的活動，作為政治攻堅戰的工具——「文化」就是「行動的武器」(operational weapon)。它以看似和平的方式，進行意識形態的戰爭，藉着文化宣傳來瓦解、改變敵對陣營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⁵ 故此，文化冷戰是在並非和平的和平狀態下進行各種實力對抗與思想博弈。

美國面向國際共產主義掀動的環球冷戰計劃，可追溯至 1947 年出爐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與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尤其是後者直接促成「文化冷戰」政策的制定，反映美國當局意識到經濟重建以外，還需要影響更為深遠及巨大的思想重建工程。1951 年，為了集結力量以加大力度打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 1945-1953 年間任美國總統)簽發總統命令。他成立了由美國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的代表組建的心理戰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簡稱 PSB)。PSB 是國家安全委員會轄下最大、並且是唯一一個常設機構。它在 1952 年的編制是 72 人，1953 年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 1953-1961 年間任美國總統)上台後，PSB 迅速增至 130 人，年度財政也由第一年的 40 萬美元增至 54 萬美元；⁶ 同年，「心理戰

⁵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17-18. 該書中文譯本：桑德斯，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頁 12-13。

⁶ 史彭海、王成軍，〈從心理戰略委員會到行動協調委員會——冷戰初期美

略委員會」被改編為「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on Board；簡稱 OCB)，被賦予更大權力統籌白宮上下與美國政府機器的形形色色冷戰行動，力求更有效地實現「心理戰」目的——「爭取人的思想，爭取人的意志」，以美國認為和平的手段，讓全世界接受美國宣揚的和平理念與普世價值。⁷

艾森豪把心理戰視為實踐真理，藉以達到美國需要的世界和平，同時反過來也以美國制定的世界和平秩序，推進心理戰實施方略。PSB 心理戰項目的實施報告，詳細記述了如何針對各階層的不同背景人士，透過各種書籍、刊物、廣播媒體等實施心理戰，瓦解共產主義威脅，讓對手接受美國的信仰與價值觀。正如論者所注意到的，在美國政府的宣傳口號中，「民主」、「自由」、「真理」是最為頻繁出現的字眼；在冷戰背景下，「真理」不僅是大家共同尋求的知識產品，更被看作是美國人的「武器」。⁸

根據一些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及研究者指出，MRA 本身便是美國官方支持下發展的思想運動，為美國的文化冷戰政策效力。⁹ 一份名為“USS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報告指出：

美國特別着力於文化領域進行顛覆活動。中情局透過和平工作團隊(Peace Corps)、道德重整(Moral Rearmament)、亞洲基金會(The Asia

國心理戰領導機構的歷史考察》，《陝西師範大學學報》，39:5(西安，2010.9)，頁 91-98。

⁷ 相關研究參見《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頁 165。

⁸ 相關論述參考于群，〈社會科學研究與美國心理冷戰戰略——以「學說宣傳項目」為核心的探討〉，《美國研究》2(北京，2007)，頁 68-83。

⁹ 相關論述參考《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頁 166-168。Jim Keith, *Mind Control, World Control* (Illinois: Adventures Unlimited Press, 1997), 185.

Fund)、□(被刪除機構名字)以及其他機構，持續不斷地從事於學院及大學的意識形態顛覆活動。¹⁰

此外，我們可以從 James Wilcott 這名曾於 1950 年代任職中情局共九年的職員身上，了解到冷戰時期中情局與 MRA 之間的直屬關係。

James Wilcott 在中情局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該局財務出納、經費營運、帳目審核、收據及代用券管理、薪資及假期調配、住房津貼及車輛登記、後勤物流(Logistics)等等的內務工作，對中情局人事與運作均了如指掌。當 1976 年美國成立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 1917-1963, 1961-1963 年間就任美國總統)被刺殺專案調查委員會——美國眾議院遇刺案特別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 [HSCA])時，在中情局是否有人涉案的調查工作上，他與同樣任職中情局的妻子(Elise)成為訪查(Investigative interview)對象。他在訪查中交代了中情局財務處項目經費檔案的行動經費時，引以為例的「黑色行動」(Black Operation: 意指由官方策動但對外公開否認的政府「秘密行動」)是一項名為 Zangokowans 的行動。¹¹在這個行動名目下，包括了 MRA 項目(project)：

¹⁰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SS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aily Report,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1 August 1969, No. 148,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A1.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成立於 1941 年；英文簡稱 FBIS。自 1947 年起，FBIS 隸屬於美國中央情報局。自 2005 年起，FBIS 併入中情局 Open Source Center。參考：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Library, “Government Documents - Intelligence Agencie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https://guides.library.manoa.hawaii.edu/c.php?g=105339&p=686901>, Accessed February 1, 2023.

¹¹ “Activities Oswald, Lee, post-russian period, political and subversive..., Leads and information CIA”, 28 January 1978. *JFK Assassination System Identification Form*, United State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

例如，zangokowans 是中央情報局的原初項目之一。它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直到 50 年代末。zangokowans 是中央情報局所說的準政治宗教組織，他們在國會和所有領域中都有成員。zangokowans 是他們的其中一條管道，把特工輸送進共產黨。那是他們曾經在□的其中一個大項目——zangokowans——他們把人們滲透到工會中，滲透到各種政治中，你知道，你能想像到的任何一種團體。例如，道德，道德重整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項目。它是由中央情報局構思的。中央情報局去接觸了所有這些宗教人士，為了這個道德重整。那就是——那就是他們的項目。¹²

我們姑且不論甘迺迪刺殺案的陰謀論及其調查工作，為何會涉及中情局與 MRA 的原因，但這個調查提及了 MRA 的工作與性質。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藉此，我們清楚看到 MRA 在戰後被美國中情局收編、改造及使用為冷戰手段的事實，特別是它在冷戰年代裡以隱蔽式的宗教運動，於政治思想領域裡抗衡共產主義的傳播，被視作民主國家陣營的「超級意識形態」。此外，我們也從美國的官方檔案，發現直接監督 MRA 展開活動的，便是 PSB 以及後來的 OCB。PSB 本身職務就是監管、協調美國十數個情報機構(諸如國務院、中央情報局、陸軍、海軍等各轄下情報機構)的運作，避免它們各自為政、相互掣肘。PSB 改組為更高政府層級人員擔任委員的 OCB，是要加強美國在全世界範圍成功地實施形形色色的冷戰戰略，全面打擊共產國際集團。本應受

Record Number:180-10089-10407. 該訪查報告共長 56 頁，針對 James Wilcott 夫婦的訪查工作由調查職員(staff investigator) Harold D. Leap 及研究職員(staff researcher) Betsy Wolf 執行。

¹² “Activities Oswald, Lee, post-Russian period, political and subversive..., Leads and information CIA”, 52 (文中空格如□，是代表被刪除的一些文字。)

OCB 監管的 MRA，在出訪國外時乘坐美國軍機環球表演、出訪食宿免費以及大批美國國會議員高調參與其中的運作情況，引來 OCB 的不滿和批評。當然，OCB 對 MRA 的批評，側面反映了 MRA 運動是美國文化冷戰規劃的核心組成內容。¹³（後文將會再論及）

OCB 管轄的機構還包括「自由十字軍」、「自由歐洲電台」、「和平與自由」、「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等等。這些心理戰，簡單來說就是要實踐一種稱為「學術性」/「教義性」或「意識形態性」的計劃，構成美國冷戰時代的「真理運動」(Truth Campaign)。¹⁴ 不可忽略的是，中情局、PSB、OCB 所主導的各種心理戰略，都是屬於隱蔽性的文化冷戰。在 MRA 的大小活動上，不會出現它們這些背後策動機構的身影。當有人要求中情局代表出席 MRA 的國際大會時，在被經過刪節的文件中可以清晰看到該局不會委派任何人赴會。¹⁵ 在涉及中情局與 MRA 的文件裏，通常會出現被刪除的人名、機構名或關鍵內容，有些附帶的文件甚至是以劃上一條粗黑斜線的空白形式呈現。¹⁶ 當然，還有更多關鍵而敏感的文件，是沒有被編入公開的檔案名冊裡。我們所見的資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MRA 這種既立足於基督教教義，但宣揚人文主義學說裏的那些

¹³ Memorandum from J. M. Schwarz to Dr. H.S. Craig reaction to the world tour of moral rearmament's (MRA) play,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White House, 30 Aug. 1955. CK2349092098.

¹⁴ 相關論述參考《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頁 166-168。

¹⁵ *Journal Office of Legislative Counsel Friday*, 1 February, 1952, CIA-RDP91-00682R000200070192-4.

¹⁶ 如 2003 年 6 月 13 日解封的中情局檔案裡，時任中情局局長杜勒斯致信媒體大亨、有美國「西岸廣告之父」之稱的 Don Belding 討論 MRA 的文件便被整頁刪除。Letter to Mr. Allen W. Dulles from Charlotte Kelly, 25 June 1959, CIA-RDP80R01731 R000200050122-4.

共同精神價值觀，十分符合 PSB 建立可以體現普世「真理」的「教義性」、「意識形態性」道德體系，被認為有效地對唯物主義展開批判。這套惟心的道德體系，強調自我反省與自我管束，不但有助於實現「民主」、「自由」、「和平」的政治理想，同時可以補足各種制度與秩序上的不完善。布克曼信心滿滿地揚言，MRA 能讓執政者贏得戰爭、取得勝利：

民主國家如果沒有這種「意識形態」，可能贏得戰爭，卻不能創建和平。因此「意識形態」的準備，應該是整個國家的工作，也是在道德、軍事、和經濟方面、國家實力的穩妥基礎。¹⁷

冷戰伊始，MRA 便在美國的總部、瑞士的歐洲總部不定期、不限次數地舉辦為期數天以上的世界大會。隨之而至的，還有資助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當中包括那些有機會被改造的共產黨員，讓他們出席在歐美總部為期數星期甚至數月的 MRA 訓練營，執行形形色色的交流項目。各地代表，齊集於 MRA 大旗下，透過聆聽美國及其盟友邦聯的代表、政治人物、社會領袖、各界名人分享道德重整體驗，交流對天下大勢的分析，分享上帝在各人心中的默示，將自我改造為一名「盡善盡美」的人，進而決志改造社會、國家、世界，讓個人、家國、天下都合乎 MRA 的道德標準，杜絕唯物主義流播，實現世界的大同。為了擴散 MRA 的影響力和發揮反共作用，電影、戲劇、歌舞、廣播、書籍、雜誌、報刊，成為生產反共知識的載體與政治動員的機器，主導人們對美國與自由世界、中蘇與共產世界的思想認知與情感空間的塑造。MRA 在美國境內，擁有三所以上的官方公開劇院，也擁有專屬的電影製作團隊、大型的歌舞戲劇表演隊伍、專屬廣播電台、大專院

¹⁷ 卜克滿(Frank Buchman)，〈佛蘭克·卜克滿博士一九四八年六月對世界廣播詞〉，《改造世界》(臺北：正中書局，1950)，扉頁。

校與青少年培育學校。MRA 也定期發行大會官方雜誌《道德重整運動通訊》，並印發不同語言版本的社會領袖勸善書籍以及他們參與運動的體驗。這一切都讓世界各地代表的道德改造經驗與見證，有了向四面八方幅射的渠道。

美國的主流刊物如《時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頻密報導 MRA 在美國境內外的活動。PSB 提交給美國總統的 PSB-2 兩份「秘密」報告裡，對如何藉出版物、印刷品實施文化戰或心理戰的做法有十分詳細的闡述。MRA 運動可謂在這些層面表現得淋漓盡致，充份反映它在戰後的重點是實踐美國反共冷戰的宣傳策略。1948 年 5 月 31 日，《紐約時報》的標題這樣寫〈60 名代表為世界問題雲集於此：舉辦道德重整是打擊共產黨及舒緩國際病痛的最好途徑〉。文章部份內容如下：

道德重整的原則為打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改善世界的經濟、政治弊病提供了最大的希望。這是昨天抵達的十個歐洲國家的代表的綜合觀點……60 名代表是應 77 名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的邀請來到美國的。¹⁸

報導續指，以美國參眾議員為名義的邀請函還強調，發展中的世界既然把「意識形態戰爭的技巧放在首位」，故如果「沒有優越思想的力量，經濟或軍事力量的話，本身就沒有辦法予以解決」。邀請函因此說，世界上數百萬人目前正在尋找積極的創造性答案——「以任何形式對付極權主義」。60 名各國代表在出席 MRA 大會前，獲安排在好萊塢露天劇場參加集會及出席世界領袖會議。

在參與 MRA 的各國國家政要眼中，推動 MRA 不但對美國的歐

¹⁸ “60 Delegates here for world session: Hold Moral Rearmament best way to combat communism, ease international ills,” *The New York Times*, 31 May, 1948.

洲重建規劃有益，同時對聯合國的運作也大有裨益。代表英國政府參與聯合國創建的外交家 A. R. K. Mackenzie 指出，MRA 的「正確的道德氛圍」，將可補正「馬歇爾計劃」在經濟重建工作的不足與聯合國制度上的不善。美國經濟合作事務局局長、福特基金會主席兼「馬歇爾計劃」執行人保羅·霍夫曼(Paul Gray Hoffman)，公開讚揚布克曼領導的 MRA 為世界作出的貢獻，更直言不諱地指出 MRA 在思想層面的成績可與馬歇爾計劃在物質經濟上的援助相互輝映。¹⁹ 在時任總統杜魯門眼中，用以宣傳 MRA 理念的舞台劇，是「戰時最重要的戲劇作品」。²⁰

不難看見，當時參與或響應這場運動的歐美政要或名人，都認為必須要建立一套他們稱為「超級」的意識形態(superior ideology)方能對付共產主義。MRA 在初創階段，公開亮出鮮明的政治立場與思想旗幟，把抗衡共產主義擴散視為要務。諸如「MRA 是優勝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²¹ 「一個理念只能被一個更好的理念征服，一個意識形態只能被一個更為優越的意識形態所征服」的論述，²² 反映了布克曼與 MRA 向共產主義爭奪人心的教條下，反共是目的，而人很可能只是實踐政治目標的手段；而一切學說、思想、價值觀與信仰不論是多麼的良善或圓滿，一旦成為意識形態的時候，都有機會成為排他性的教條，約束人們的思想與行為，使之趨同以至於單一。整個人從頭到腳都被再武裝，借用基督教新約《聖經》所說的，這就是「新造的人」

¹⁹ 保羅·霍夫曼(Paul Gray Hoffman)，〈民主國家靈感的「意識形態」〉，收入卜克滿《改造世界》，頁 61-62。

²⁰ 麥肯琪，〈序：佛蘭克·卜克滿——其人及其工作〉，收入卜克滿《改造世界》，頁 8-12。

²¹ “Change in a revolutionary age,” *MRA information service* 1:7 (10 May 1953): 25.

²² “Security and the ideological,” *MRA information service* 1:7 (10 May 1953): 27.

了，擁有可以挑戰世間邪靈惡魔的力量。1955年8月，《時代》高調宣揚 MRA 說：

道德重整是一場實力雄厚的運動，旨在「促進個人、社會、種族、民族和超自然的救贖」。M.R.A.的參與者認為自己是抗禦共產主義的最佳意識形態。如果許多美國人了解 M.R.A.，他們可能會覺得共產主義不那麼令人作嘔。目前，來自 M.R.A. 的 192 名代表和演員。正在乘坐美國空軍運輸機(U.S. Air Force transports)前往南亞和中東地區的首都巡迴上演名為「消失之島」三幕音樂道德劇。²³

MRA 對外公開宣稱不涉及政治，是一個與政府沒有關係的宗教組織；然而，這樣一種非政府組織的交流團、表演團，它能夠公然乘坐美國軍方的空軍飛機環球訪問，絕非等閒之輩、尋常之事。即使在美國國內，這也曾引起嘩然和質疑。全盤統籌世界冷戰方略的 OCB，對 MRA 如此高調的做法亦批評甚厲。²⁴ (詳見後文)

對此，MRA 第二號人物霍華德(Peter Dunsmore Howard, 1908-1965) 於其著作中，曾道明其來龍去脈，指出這個安排是得力於參議員威廉·諾蘭(William Fife Knowland, 1908-1974)與美國國防部、空軍部長等的協商，讓 MRA 可以使用三架美軍軍機進行環球巡迴表演。值得注意的是，諾蘭是戰後美國最具影響力之一的共和黨參議員兼多數黨領袖，也是冷戰時期主導國會外交政策及冷戰資金運用的主要人物，其外交政策主要涉及亞洲為主，包括對華政策。他是當時著名的反共美國政要。曾隨團參與 MRA 劇團的民主黨籍眾議員 Charles B. Deane 公開認為，

²³ "Organizations M.R.A.'s Message," *TIME*, 15 August, 1955.

²⁴ Memorandum from J. M. Schwarz to Dr. H.S. Craig reaction to the world tour of moral rearmament's (MRA) play,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White House, 30 Aug, 1955.

在 MRA 的旅程上動用美國空軍對美國是有所裨益的。²⁵

關於「消失之島」(The Vanishing Island)舞台劇的巡迴表演，最初的方案應是以中情局背後管理的飛機為運輸工具的。中情局局長杜勒斯(Allen W. Dulles, 1893-1969)、美國空軍上將兼中情局副局長卡貝爾(General Charles Pearre Cabell, 1903-1971)及其他九名人士，曾經就是次有大批政要及來自各國的 MRA 參與者的交通問題開會商討。是次會議的 11 名出席者中，中情局副局長級的還有 Richard Mervin Bissell, Frank Gardiner. Wisner, Robert Amory Jr., Colonel Lawrence Kermit “Red” White, Lyman Kirkpatrick, Richard McGarrah Helms, Richard M. Bissell Jr., Huntington D. Sheldon 八人。他們根據「道德重整委員會」(Moral Rearmament)代表、²⁶ MRA 美國總部負責人 Ray Foote Purdy(1889-1965)與杜勒斯商談有關事宜後，召開了會議商討落實的方案。

是次開會內容的重要發言，如杜勒斯、Mr. Helms 等人的都已大篇幅地被以空格的形式遮蔽，故無從稽考其討論內容。但從 Col. Write 未完全遮蔽的兩段發言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中情局在全球推進 MRA 發展的事工上盡心盡力。相關文字指出，杜勒斯與 Ray Purdy 談及是否用 CAT 乘載 MRA 表演團的問題，而杜勒斯指出任何活動要 CAT 提供交通配備，都應該在嚴格的商業基礎上進行。²⁷ 所謂商業用途，相信只是中情局慣常的掩人耳目隱蔽做法。CAT 背後的金主及管理人，本身便是中情局。CAT 全名是 Civil Air Transport Incorporated，

²⁵ Peter Howard, *An Idea to win the world* (London: Blandford, 1955), 43; “MRA Troupe Ends Air Tour,” *The New York Times*, 1 September, 1955.

²⁶ Manuscript Division staff (prepared by), *Moral Re-armament Records: 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Washington, D.C. : Library of Congress, 2011), 5.

²⁷ *Deputies’ Meeting*, 18 May, 1955, CIA-RDP80B01676R002300170012-8.

中文名是「民航空運公司」，本為國民政府擁有，至 1950 年初為中情局收購。這些飛機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用以進行秘密政治及軍事行動時的運輸工具。²⁸

為了妥善解決 MRA 的全球宣傳之旅及巡迴表演的交通安排，中情局沒有懈怠。Col. Write 指出還有其他政府機構參與這項行動。中央情報局有需要成立一個由一眾副局長——DD / P(Deputy Director / Plans; 副局長 / 計劃)、DD / I(Deputy Director / Intelligence; 副局長 / 情報)和 DD / S(Deputy Director / Support; 副局長 / 支援)為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就中情局如何參與提出建議。杜勒斯批准了這項建議。²⁹ 但讓人意料之外的是，最後的方案是 MRA 表演團與隨行的美國政要、各國代表，他們乘坐的是三架大型美國空軍運輸機。這比乘坐表面上是商業用途的 CAT 飛機，看似更為風光，無怪乎 MRA 官方歷史介紹時都不忘提及此事。無庸置疑，乘坐美國空軍運輸機的舉動，也更含文化冷戰意味，更加透顯美國霸權的時代象徵。

進言之，只靠政治、軍事與經濟資源上的支援，在 MRA 的語境裡是絕不足以抗衡國際共產主義的擴張——以美元為手段的經濟援助也不足以維護美國本土的國家安全。因此，在強大的軍、政、經濟實力以外再加上 MRA，如此才能為美國、為全球反共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為某某「提供答案」，成為了布克曼的信念與掛在嘴邊的口號，他與追隨者以「義不容辭」的姿態為全世界不同國家、地方的人們提供大大小小救助時弊的「答案」。MRA 十分高調的言行與姿態，實際上也反映了論者談及的一種深埋於美國文化基因裡的特質，

²⁸ 民航公司背後涉及的冷戰政治或地緣政治的論述，請見麥志坤，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2018），頁 37-38，106-113。

²⁹ *Deputies' Meeting*, 18 May, 1955, CIA-RDP80B01676R002300170012-8.

就是「自立國起就以『上帝選民』自居，認為自己的思想、價值觀念、民主制度都是最優越的，有向全世界推行的責任。這是與宗教信仰相聯繫的一種傳教士狂熱精神。」³⁰ MRA 的世界運動，充份反映了這層思維特質、政治立場與宗教信仰定位。

(二) MRA 的意識形態戰爭：政治的宗教、宗教的政治

在前述中央情報局職員眼中以及學者的研究裡，MRA 都被看作是一個「政治宗教組織」(politico-religion organization)或準政治宗教組織(a quasi-political religious organization)；它集結以基督教、天主教為中心的宗教信仰者，並聯結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乃至無神論的人文主義者，試圖改造現今世界，把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視作主要及最終的意識形態的對手，並將共產集團管治下的國家視為不道德的社會。³¹ 隸屬英國外交部、專為冷戰時代反共戰爭而設的秘密「情報研究部門」(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ngland; IRD)，指出 MRA 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反共產主義的組織。³²

目前有關 MRA 的研究不多，當中注意到它是美國冷戰戰略組成環節以及它的在地實踐情況的，則更為鮮見。桑德斯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是一眾冷戰研究著作中，注意到 MRA 是美國官方高層

30 相關論述參考：資中筠，《資中筠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106-112。

31 Richard H. Palmer, "Moral Re-Armament Drama: Right Wing Theatre in America," *Theatre Journal*, 31:2 (May, 1979): 173-174.

32 "I. R. D's view of Moral Re-armament as An anti-Communist Weapon",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ngland*, 3 May, 1962, The National Archive(TNA), Record of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FO/1110/1581.

直接操控的「心理戰」項目的著作，但她沒有對 MRA 運動的本身活動展開任何研究，更沒有觀察它在美國境內外的傳播情況。另有一名學者 Tatab Mentan 也注意到 MRA 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及推動的心理戰術機構，與和平工作團隊(Peace Corps)、美國新聞署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同屬美國最為重要的「隱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³³遺憾的是，這部以非洲為研究對象的書，如同桑德斯的著作，並沒有展開深入的論述，更沒有研究它如何在某個地方開展文化冷戰工作的況。目前可見的論著，都只是提及 MRA 與中情局有關係，但都沒有提供注釋或論證資料出處以供查核。³³故 MRA 如何打上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鬥爭烙印，怎樣為美國當局的政治服務，用什麼方法消滅敵對陣營、爭取人心倒向以美國為中心的思想價值體系，這些十分值得我們仔細檢視的。

在 1943 年 7 月，美國麥基諾島(Mackinac Island)訓練中心開幕，這標誌着道德重整運動的活動範圍進一步從歐洲擴展至美國。布克曼發表了名為〈論思想戰〉的長篇開幕講詞，首段內容開門見山指出世界的情形因為「共產主義」的發展，逐漸發生了變化。他的通篇演講的重心，在於闡明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危害世界的兩大思想勢力。布克曼在歐戰熾熱之際，既批判了軸心國的法西斯主義，同時也否定了同盟國中國、蘇俄的共產主義。相反，民主、人權與自由則被看作是體現上帝意志的價值觀，故此符合人心需求，讓道德基礎得以維繫，實現社會公平與世界和平。

布克曼在他的演講中，敦促美國要整治唯物主義，也要發現 MRA 才是美國的「正確的意識形態」。MRA 如此強調它就是美國對付唯物

³³ Tatab Mentan, *Africa in the Colonial Ages of Empire: Slavery, Capitalism, Racism, Colonialism, Decolonization, Independence as Recolonization, and Beyond* (Cameroon: Langaa RPCIG, 2018), 245.

主義的正確意識形態，在於它宣稱自己是從美國的「基督教的傳統得來」的宗教立場有關。布克曼說明了，MRA 的反共事業是關係到保護美國立國根基的護教衛道行動——「今日世界的真正陣線，不是階級和種族」，乃是「信仰基督與反基督者之間」的戰爭。這就是美蘇冷戰仍未激化之際，布克曼便率先跳出來要為美國社會病源把脈尋方的原因；而這同樣也是 MRA 急於要為美國所代表的民主集團與共產國家進行思想對決預先作好預備的原因。³⁴

1948 年，是馬歇爾啟動歐洲復興計劃的第二年，也是 MRA 邁向全球的重要發展時期。在美國，布克曼向全世界發表電台廣播，強調民主國家要團結一致，一起建立一種「超級意識形態」，使之成為對抗唯物主義的「超級武器」：

道德重整運動在今日特向民主國家和整個世界奉獻一個「意識形態」的超級武器，如果沒有它，一切的軍事戰爭是白打的，政治家的心力是白費的。因為分裂是這一時代的特徵，所以團結才成為迫切的需要。分裂是人們的驕傲、怨恨、情慾、恐懼和貪吝產生的工作，分裂是唯物主義的商標，團結是再生的恩德。我們失去了團結的技術，因為我們忘記了革新和再生的武器。「革新」是這個超級「意識形態」的中心。³⁵

在具體的思想實施上，MRA 強調最根本的方法是從自身開始「革新」，用布克曼的話說便是，「如果你想把今日的世界問題解決，最好的辦法是從你自己做起」。即是，要從個人的道德反省做起——先在上帝面前默禱領受啟示，自我改造，克己恕人，從個人到家庭然後推及到社會、國家乃至世界，層層革新與改造，並且是要超越民族、政見及

34 卜克滿，〈論思想戰〉，《改造世界》，頁 65-73。

35 卜克滿，《改造世界》，扉頁。

宗教的隔閡，重建人類的共同道德價值、促進國與國的團結以至實現天下大同。³⁶

布克曼宣稱，MRA 雖然是以基督教精神為基礎，但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基督教教派或隸屬於某個宗教組織，參與者不論是什麼信仰——天主教、猶太教、新教、印度教、回教、佛教、和孔子之徒，只要認為「人類需要改變時」，都能同走 MRA「這一條大道」。³⁷ 它的「大道」並不是什麼高深的「教義」，是透過各種媒介與場合，在四個「絕對」道德標準的基礎上，宣講着一堆各國人民耳熟能詳的詞彙或觀念——「博愛」、「和平」、「團結」、「友愛」、「自由」、「正義」、「平等」，呼籲當今世要打破因戰爭造成的仇恨與分裂，彼此和解、相互包容、和平共存。諸如此類口號，大概是把見於古今中外的標語、箴言置放於一個被稱為「基督教」精神的大布袋下，被他重新演繹一遍後彼此之間圓融無礙地共存並生。MRA 成為了溝通世間各種宗教及學說提供力量，進而基於其擁有的雄厚財力及美國為之搭建的世界舞臺，使相互寬恕、相互諒解及相互接納的主張在各國的緊密交流及互動中被活生生地實踐出來。這讓 MRA 變而成為一種現世可宣揚、能實踐的和平主義(Pacifism)。

MRA 的那些淺顯理念，在港臺代表的視域中，被推崇為等同傳統儒學的省身、改過、遷善的「致良知」之法。尤其是布克曼的“*When Man listens, God Speaks, When Man Obey, God Acts*”，這被完全等同於儒家所說的「致良知」意義——如了解「致良知」，自然就會了解「上帝啟示」；「上帝」也被視作與「天理」，「真善美」或「自由

36 卜克滿，〈我們迫切的需要〉，《改造世界》，頁 29-36。

37 卜克滿，〈對付任何主義的辦法——連唯物主義在內〉，《改造世界》，頁 106。

意志」等價值觀念的理一分殊體現。³⁸

在具體傳播信息或宣揚教導時，MRA 的做法與一般的基督新教教會的靈修生活沒有太大區別，彼此都十分重視個人的自省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環節。諸如每天的靜坐默禱、分享日記、彰善糾過、自我批評、共同悔罪，是 MRA 訓練大會中參與者不論是信奉何種宗教或學說者都每天必須操持的修德工夫。³⁹ 這種宗教性的儀式與明清時期士人參加「省過會」、記錄「省過簿」、互相傳閱「修身日記」等等，有幾分相似之處。⁴⁰ 大家都在強調道德的緊張感，重視心靈與精神、思想與行為的重要性，並且肯定道德覺醒的巨大改造力量。1955 年 10 月，當香港代表司徒約翰出席瑞士舉辦的世界大會後，回港召集同人聚會，分享世界大會所學心得。他把如何自省察過、如何強調靈修的體驗公諸同好，與會者則把 MRA 此舉直接視作中國先儒「吾日三省吾身」的教導。⁴¹ MRA 在香港的主要負責人、曾任汪精衛秘書的李毓田(1902-不詳)指出：

道德重整運動雖說是淵源於基督教，但事實上它與中國傳統思想是最為吻合的。卜克門博士在四十年前居中國甚久，並且訪問過曲阜孔廟，說不定他的思想還是從孔學的出發點而來。⁴²

國民黨的著名反共作家陳紀滢(1908-1997)，曾以中華民國代表的身份參

38 李毓田，〈道德重整運動與中國傳統思想〉，《到光明之路》(香港：亞洲出版社，1955)，頁 33-37。

39 陳紀滢，《在柯峯》(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62)，頁 13。

40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2013)，頁 227-340。

41 〈司徒代表歸來報告。道德重整大會經過〉，《華僑日報》，1955 年 10 月 30 日，3 張 2 頁。

42 李毓田，〈道德重整運動與中國傳統思想〉，《工商日報》，1958 年 4 月 18 日，頁 6。

與瑞士柯峯訓練大會。他詳細記述下連串經歷：MRA 規定參與訓練大會的成員，必須每天清早先作個人靜坐，向上帝默禱，尋求啟示，然後進入集會環節，三、五人一組進行道德交流。一名資深成員充當「訓導」、「攻擊者」、「訓練者」，在他的引導下彼此自我批評、悔過遷善。⁴³ MRA 十分重視通過電影、戲劇、音樂等現代社會的新媒介，讓出席大會或訓練項目的成員，每晚都集體觀賞帶有鮮明道德教化的自制節目。在一個共同的情感空間下，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員們，隨着影視歌劇的影像、音樂、色彩乃至內容情節的發展，置身同一空間下經歷同一氛圍的塑造，透過情感的交流而重整歷史認知與思想價值觀。MRA 也致力於將這些媒體節目及表演，透過合唱團、歌舞戲劇團與影片傳銷，向美國境內外各地社群大力推廣，使受眾在單純說教以外的感官體驗下，獲得新的文化政治啟蒙。MRA 的道德反省與思想改造、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觀傳遞，從個人的情感空間擴展至社會層面，讓 MRA 在戰後世界鼓吹的國家和解、世界和平的信息得以普泛化的發展。

MRA 每年均舉辦道德重建訓練大會，邀請全球各國代表親赴歐美總部。一般來說，大會都會安排各國代表拜訪所在國的政府部門，然後展開形形色色的思想交流及互動，並在為期或長或短的道德訓練生活營的體驗下，了解西方生活方式、審美趣味、價值觀念，培養參與者在文化精神上認同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精神。布克曼與他的繼任人、跟從者都十分喜歡援引某某國家某某資深共產黨員或政治領袖或名人的事例，說明他們在接觸 MRA 後受到感化的皈依故事，援用以宣傳 MRA 的悔罪、諒解、充滿包容性的理念，進而證明它有強大力量改造任何人及改變任何事。MRA 針對知識階層及有影響力的群體做

⁴³ 陳紀滢，《在柯峯》，頁 103-104。

工作，十分符合 PSB 的「教義性項目 / 學術性項目」(Doctrinal Programme) 中所規定的戰略方針，有關項目的心理戰對象主要是「高級政府官員、記者、教授、學生、教師及進步的商業領袖」。報告文件中認為，這群人主要是一群擁有「發達頭腦」(the developed mind)的知識精英(intellectual elite)、社會輿論領袖，他們本身對哲學或意識形態感興趣，同時也能對之作出個人判斷，在日常生活中善用知識的力量(intellectual power)左右他人。⁴⁴

布克曼的繼承人霍華德在《贏取世界的理念》一書，透過援引各國參與 MRA 的「知識精英」與「輿論領袖」的言論，闡明一個道理：只有民主、自由不足以對抗共產主義，美國不斷地從華盛頓輸出金錢去幫助歐洲重建、協助亞非國家購買硬件(hardware)——槍炮、坦克、飛機、炸彈，這些都不能夠有效對付共產政權；經濟、軍事援助，民主、自由理念的宣傳都不足夠——必須加上 MRA 方能真正阻遏共產主義擴散。否則，共產主義國家將不需要世界大戰便可征服全世界，這將對西方的民主制度作出「譏諷」。⁴⁵

不過，民主集團裏的其他國家情治機構，對冷戰時期 MRA 的性質、運作與效用是有所警惕的。1952 年 1 月，英國國防部轄屬的英國科技情報理事會(Ministry of Defence, Directorate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主管 Hugh Young 在一封函件裡指出，他在倫敦出席了布克曼家中的聚會，聽到 MRA 被宣傳為最佳的反共武器(the best weapon against communism)，此論使他印象深刻，但也讓他對 MRA 的反共效能產生好奇。他迫不及待地對這個已遠離原初宣傳福音而深涉政治意識形態的運動/機構展開追查，

44 "The U. S. Doctrinal Program, PSB D-33/2," *Memorandum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5 May, 1953. CIA-RDP80R01731R003200050006-0.

45 Peter Howard, *An idea to win the world*, 7-15.

直接向時任軍情五處(Security Service 俗稱 M.I. 5)主管 Dick White 查詢。一旦獲得結果後，他要考慮的是國防部情治部門對 MRA 應該採取哪種迎拒態度。⁴⁶

1953 年 4 月，一名高階官員敦促負責反間諜工作的國家安全局(M. I. 5)第四分支(D Branch)負責人 Malcolm Cumming 要嚴加盯梢布克曼及 MRA 正在進行的活動。在這名官員看來，MRA 這個既談宗教同時又涉及政治的組織無疑是在積極反共，但他感到更值得查核與警惕的是以下二事：

第一， MRA 擁有源源不絕的無限資金；

第二， 布克曼在印度之行臨時脫離二百人團隊，在開羅與反英著稱的埃及革命領袖納吉布將軍(Mohamed Naguib 於 1953 年 6 月起出任埃及共和國首任總統) 會面。⁴⁷

在英國主管情報系統及國家安全的官員眼中，雖然 MRA 有其強烈的反共產主義的性質，是冷戰中的武器(a weapon in the cold war)，但對 MRA 成員的複雜性及其政治立場欠缺穩定性、對 MRA 高層好作高調的言論有所質疑。⁴⁸ 至 1960 年代初，隸屬英國外交部的“Information Research

⁴⁶ Hugh Young to D. G. White, 1 Jan, 1952, TNA, *Records of the Security Service, The Oxford Group: Moral Re-Armament Group*, KV 5 / 67, H. S. Young 1954 年出任 Director of Directorate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 D. G. White (Dick Goldsmith White), 1953 年出任 Director General in M.I.5 (軍情五處)，並於 1956 年同時管轄軍情六處(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俗稱 M.I. 6)，英國史上首名兼管兩個情報機構的高級官員。

⁴⁷ Unknown (發信人名字被遮蓋，代號為 S. I. S.) to Colonel Malcolm Cumming, 21 Apr, 1953, TNA, KV 5/ 68 . (Malcolm Cumming，軍情五處情報官，是前注 D. G. White 的下屬，後出掌反間諜行動的第四分支(D Branch)。

⁴⁸ Roger H. Hollis (Foreign Office) to E. C. Williams (Ministry of Defence), 20th June 1956, TNA, KV 5/ 69.

Department”，⁴⁹ 還在調查 MRA。當局指出要十分小心謹慎地與 MRA 打交道，否則，政府提供的反共資訊往往會被 MRA 的激進份子過度演繹和情緒化地誤用。MRA 的性質或面相，表面上看似是宗教性的思想更新運動，但實質上被英國當局看作是披戴宗教外衣的政治運動。⁵⁰

於 1954 年成為首任英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辦、1962 年出任英國駐蘇聯大使的杜維廉(Humphrey Trevelyan, 1905-1985)，他本人便認識布克曼，他如此評價 MRA：「我非常清楚，MRA 壓倒一切的動機是「反共產主義」，並不存在任何的個人救贖的急切性。」杜維廉還指出與 MRA 這個「十分有錢」、「高效」的機構合作反共時，不但會出現「適得其反」的不良結果，MRA 還會向政府得寸進尺地予取予攜(“If you give them an inch they will take an ell”)，因此，他認為英國在反共的工作上不能夠與 MRA 發生聯繫。⁵¹

儘管布克曼及其追隨者不斷強調 MRA 是一場宗教性的思想革新運動，但同時又毫不諱言它是一場與「侵略的唯物主義和靈感的民主主義的鬥爭」。⁵² 更甚者，MRA 四出巡迴表演的歌劇團，甚至刻意地強調他們是獲得美國政府支持及資助的團體，這就難掩其自我矛盾之處，同時暴露了它被美國中情局收編後的不安本份舉措。關於這一點，我們不難聯想到上文有關 OCB 對於 MRA 的批評。當 MRA 這個被收

49 資訊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是冷戰時期英國外交部轄下的部門，負責對外宣傳及在國內外執行秘密心理戰行動。參參志坤，《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頁 218。

50 “I. R. D’s view of Moral Re-armament as An anti-Communist Weapon,”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ngland*, 3 May, 1962, FO/1110/1581.

51 “I. R. D’s view of Moral Re-armament as An anti-Communist Weapon,”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ngland*, 3 May, 1962, FO/1110/1581.

52 麥肯琪，〈序二：佛蘭克·卜克滿——其人及其工作〉，收入卜克滿《改造世界》，頁 11。

編的政治宗教，一旦過於高調或者是未能禁止其過於張揚地自我宣傳，它便會對美國政府的支持、資助以及美國政府的環球文化冷戰戰略帶來不良影響——1955年MRA在遠東及中東開展的大規模亞洲巡迴表演與訪問之旅，便引起部分美國情治部門不滿。MRA的領導們在此行中，無時無刻都有意讓亞洲各國政府相信MRA是美國政府支持及資助的。當MRA利用美國政府提供的便利與特權在發展自身的組織的影響力時，讓本來收編MRA的中情局有所不安，也讓其他統籌美國海外文化冷戰的情治部門側目，最終使它們對MRA能為美國當局提供政治奧援的用心與成效產生質疑。⁵³

美國情治部門特別注意到在MRA的領導階層，把乘坐美國空軍運輸機及機組成員刻意說成是MRA運動的一部份。這種高調的言傳口說，對美國實踐文化冷戰策略而言無疑是有害無益。譬如美國國會的重要政治領袖參與了1955年「消失之島」歌劇亞洲巡迴表演之旅，⁵⁴姑且勿論MRA是如何藉此宣傳美國政府給予其什麼樣的支持與資助，他們的參與自然而然地讓亞洲國家的領袖理解為這就是美國政府的作為，因此而作另類的對待或青睞。美國當局也注意到，亞洲國家領袖的受邀者，他們的一些恭維縱或出於禮貌性的贊詞，但往往會被MRA擷取來證明各國政要對他們支持的明證。舉凡種種，都讓本要在宗教思想及意識形態戰線上發揮隱蔽戰略的MRA，最後在美國的

⁵³ *Foreign Reaction to the MRA Play the Vanishing Island*, 14 September, 1955, CIA-RDP78-02771R000300250002-7.

⁵⁴ 中情局檔案列出的美國「重要」政治領袖，分別是：Speaker Samuel Taliaferro Rayburn (January 6, 1882-November 16, 1961); Minority Leader Joseph William Martin Jr. (November 3, 1884-March 6, 1968) 及 Majority Leader John William McCormack (December 21, 1891-November 22, 1980). *Foreign Reaction to the MRA Play the Vanishing Island*, 14 September, 1955, CIA-RDP78-02771R000300250002-7.

幫助下反變為「布克曼主義」。

從 1955 年到 1959 年，中情局均有文件顯示情治部門在關注着 MRA 的執行情況與成效。較引起注意的是，MRA 領袖們明裡暗裡打着美國的旗號自行其是，所囊括的對象具有排他性，主要針對政府高官與紳商領袖而排除了普羅大眾。再加上 MRA 宣傳的意識形態於批評者眼中，反倒錯誤有害地為共產主義描繪出更具吸引力的圖景，但又在膚淺而庸俗地彌合民主與共產主義的差異。因此，MRA 的使命宣言與歌劇只吸引了那些本身便已傾向 MRA 及親西方組織的觀眾，但對亞洲一般民眾而言，只會讓他們驚覺地理解為這是美國官方觀點，因而有意逃避接觸這種「另類」的觀點。上述的這些分析及批評，很可能便是出於 OCB 的監察結果所寫成的報告。⁵⁵

這樣，難免讓人想到，到底是美國利用布克曼的宗教思想改造的運動進行反共政治目的？還是布克曼在利用美國政府來推動他的 MRA 事工在全球的擴散與發展？當中的界線，今天雖然已經很難一一釐清，但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它們彼此之間是有相互利用的地方。MRA 努力闡釋的超級意識形態，有助於美國在世界各範圍建立其政治文化霸權，而美國在利用 MRA 的同時也促進了 MRA 在美國本土乃至全球化的發展。

⁵⁵ 1955 年 9 月 14 日所示的中情局檔案 *Foreign Reaction to the MRA Play the Vanishing Island* (CIA-RDP78-02771R000300250002-7)，其大部份內容另見於 1958 年 9 月 2 日的一份關於 MRA 發展的中情局備忘錄 “Memorandum for □ : Subject: Moral Rearmament,” 2 September, 1958, CIA-RDP78-02771R000300250001. (這份備忘錄見於美國中情局檔案，惟會議紀錄名稱、收件及發件人名字皆被遮蓋，無法準確得知涉及的人物及部門，但按美國當時執行海外冷戰情治工作的機構觀之，有可能是 OCB。)

三、道德重整運動在香港的緣起與人際網絡：第三勢力餘部

戰後的香港不只是英國在管治，美國勢力也直接介入了這個地方。因為韓戰、冷戰的緣故，它成為美國實施全球戰略的關鍵位置，一變而為貫通日本群島、臺灣與菲律賓、馬來西亞的據點，築起圍堵共產中國向太平洋擴散的第一島鏈防線。同時，香港也成為美國窺探中國政情與經濟發展的最前線。單就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工作人員便高達六、七千名，美國的「冷戰鬥士」在此高度活躍，視香港為冷戰年代的「東方柏林」、亞洲情報中心與「東亞冷戰」基地。⁵⁶各種帶有反共意識的出版物與資訊，在香港被源源不絕地分發至各地。⁵⁷為了抗衡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馬列毛思想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化、道德教育等等的思想建設，都被重新包裝成為圍堵、遏制敵對勢力的武器。不過，香港的政治空間正因為英、美、大陸及臺灣方面的各方勢力互動、爭競與抗衡，再在港英政府「去政治化」的政治管控下，沒有孤峰突起政治勢力左右着社會發展。不獨第三勢力難成為具影響力的政治團體，MRA 在港也不易發展為具備強大社會號召力或者是擁有

⁵⁶ 所謂「東亞冷戰」主要是指由美國主導下日本、臺灣及香港三地構成的人馬對抗中共及蘇俄意識形態的思想文化鬥爭，這是一場與軍事、外交圍堵政策同時並進的「文化冷戰」。以香港為例，第三勢力便是其中一股體現「東亞冷戰」氛圍的政治活動力量；在美國眼中，它是一股「有助於宣傳、圍堵乃至武裝對抗共產勢力」，因此而獲得美國政府的援助。相關論述參考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不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頁 274、282。

⁵⁷ 有關文化冷戰以及香港在冷戰時代的定位，相關論述請見陳學然，〈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臺大歷史學報》，70（臺北，2022.12），頁 167-244。

長久影響力的組織。儘管如此，MRA 在冷戰香港的複雜社會環境下，還是浸浸然興起。

MRA 在香港的參與群體，基本上有兩批人。第一批是在港安居樂業的社會專業人士，當中的核心人物是香港聖保羅女書院首任校長胡素貞(1891-1979)。另一批是 1949 年國共易幟後南來香港的親國民政府知識分子及原「第三勢力」人士，當中以張發奎(1896-1980)、李毓田、凌道揚(1888-1993)、蔡貞人等為代表。⁵⁸

胡素貞及其兄長胡惠德最早在香港推動 MRA 發展。胡素貞早於 1916 年便認識來港視察宗教及教育事工的布克曼，從此成為布氏的追隨者。除了胡氏兄妹外，1950 年代參與 MRA 的在港人士還有潘頓 (Rev Hedley Bunton; 香港中華基督教教區五十四所學校總校監)、英國人司徒約翰(英資太古公司福建輪船船長)、蘇達立(Dr. S. D. Sturton, 胡惠德香港養和醫院同僚，時任 X 光及電療部門主管)以及曾昭憲、朱嘉理等人。李子農(港府華人高官、1950 年代任副華民政務司)及何明華(香港聖公會主教)在 1950 年代初期，也曾參與 MRA 的活動。可惜的是，極少資料顯示 MRA 在 1950 年代初期的香港社會有過什麼樣的社會活動。再加上胡素貞自 1952 年退休離港，MRA 於隨後數年的香港便更沒有公開活動。直至 1950 年代中後期，

⁵⁸ 關於第三勢力在香港活動的研究，黃克武與陳正茂已有專書深入探究：黃克武，《願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不可能》；陳正茂編著，《50 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秘》(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傅葆石的論文聯繫美國冷戰計劃與香港第三勢力興起的關係作出扼要論述。參見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 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73(香港，2019)，頁 48-56。另外，王梅香對於第三勢力在香港的文化出版工作及其與美國亞洲基金會的資助也有詳細的研究，見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1(臺北，2020)，頁 127-128, 141-142。

已經分裂的「第三勢力」集團部份人士相繼加入後，MRA 在地活動才漸漸增多。

根據黃克武的研究，香港的第三勢力陣營主要以汪派、桂系、反蔣立法委員、中國民主社會黨等人組成，並且形成以顧孟餘及張發奎為中心的集團。⁵⁹ 另外，據陳正茂的研究，則特別強調「戰盟」為香港第三勢力的主要團體。「戰盟」全名為「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當中以「三張一顧」（張發奎、張君勱[1887-1969]、張國燾[1897-1979]及顧孟餘[1888-1972]為核心）。⁶⁰ 活躍份子計有三十多人，胡志偉再把他們歸納為七類人：一、如張君勱為代表的失意政客；二、以張發奎為代表的落魄軍人；三、以童冠賢(1894-1981)為代表的桂系要員；四、以張國燾為代表的中共叛徒；五、以陳中孚為代表的漢奸；六、以顧孟餘為代表的知名學者；七、以胡越(司馬長風)為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⁶¹ 反共、反蔣第三勢力的主流觀念與思想立場，他們期望以超然獨立之姿自別於國共以外的政治組織。但它與 MRA 香港協會一樣，沒有形式化的機構或職能部門，而二者的成員都是基於理念與信仰走在一起。第三勢力奉守民主自由的信念而自詡為民主信徒、自由鬥士，MRA 的參與者則奉四個絕對道德的宗教信念自詡為和平的締造者；二者共同的信念又均以反共為相同的思想核心與行動方向，滙合成冷戰時代的反共意識形態。

不少學者的研究都已告訴我們，組成第三勢力的人士是孳然雜亂、派別眾多的。在一眾派別中，惟獨張發奎為中心的群體與 MRA 最為密切而參與其中。很大程度上，這是與張發奎本人鮮明的反共但不公

59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不可能》，頁 228-260。

60 陳正茂，《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冷戰時代滯港及流亡海外的第三勢力滄桑錄》（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21），頁 103。

61 胡志偉，〈「自由中國抵抗運動」的開場與收場〉，《傳記文學》，93:6（臺北，2018），頁 48-49。

開反蔣的立場有關，致使他的圈子透過 MRA 這種文化、教育類的隱蔽性冷戰活動，與臺灣方面交流頻繁。可以說，於反共路線上，MRA、1950 年中期在港第三勢力餘部、臺灣當局彼此是無縫接合。相反，另一名第三勢力的要角張君勱，他雖然知道 MRA 的活動，甚至曾有所聯繫(見下文)，但他沒有參與 MRA 的活動。在專門督責第三勢力運作的美國情治官員眼中，張君勱對蔣介石及其領導的政府的敵意(animosity)，絲毫不亞於對中共的反感。他也堅拒美國的建議前往臺灣，不與蔣介石有任何的接觸或合作。美國官員在支援第三勢力的同時也清楚知道，美國當時的反共事業是不可能在蔣介石以外找到可以替代(alternative)的政治領袖。美國雖然十分希望能夠扶助有朝氣活力的政治領袖，但繞開蔣介石的話，便不可能取得可觀成果。因此，扶植第三勢力發展之餘，如何設法讓他們與蔣介石合作，令美國有關人員費盡心機。防止張君勱一類的第三勢力要員不公開攻擊蔣介石，不對國民政府造成傷害及尷尬，同樣也成為美國的推手要小心應對的事情。美國的一眾推手中，包括了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 1906-1993)。他於 1954 年出任美國駐香港領事，1958 年起任駐中華民國大使。⁶²

於美國情治人員而言，他們要恪守的是，在香港或海外推動各種政治活動，都應該要有效推進美國國務院主導的 USIE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政績，不能夠只為「懶散

⁶² Everett F. Drumright (Counselor of Embassy, American Embassy, New Delhi) to Troy L. Perkins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17 December, 1951, 350.2 *Third Force (1951)*,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U.S.—China Relation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Collection.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本文引用的美國檔案部分來自電子資料庫 *Gale Primary Sources Archives Unbound*。“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U.S.—China Relations: Records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為該資料庫的檔案卷目。

的中國人」增加就業機會，更加不能妨礙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關係，當然也不可以削弱國府政權的威望。因此，團結在港反共勢力是美國主管遠東事務官員至為重要的核心工作。總之，不論是美國還是香港的華人，如要在反共上有成績，便一定要與國府協力——這是美國官員在當時的基本態度。⁶³

第三勢力這個揉合不同派別的集團，還是在 1953 年分裂了。它的不少成員先後奔赴美國、日本、臺灣及東南亞。留港群體中，主要是以張發奎為中心的成員。張發奎在第三勢力群體中反共不反蔣的立場廣為人知，而他的政治底線也為美國白宮「中國事務處」的專責官員所熟知。該處官員透過曾經在港活動的甘介侯(1897-1984)提供的情報，了解到張發奎圈子有意加入蔣介石掌控的國民政府執政陣營。甘介侯曾任李宗仁(1891-1969)私人代表，前往美國面見時任總統杜魯門，促成李宗仁與杜魯門會面，而他後來也曾出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一職。在他的描述下，張發奎陣營有意在國府任職，張君勱以反蔣為其討價還價的策略，目的是要撈取更多政治利益。甘介侯在陳立夫(1900-2001)兄弟陣營的潘超英、天主教主教于斌(1901-1978)那裡，聽到一些消息——張君勱間接獲得蔣介石的出國經費資助、「張君勱與蔣介石合唱雙簧」。甘氏把這些傳言寫下，交到了美國國務院的 Troy L. Perkins 手上。⁶⁴

張發奎及其 1953 年留守香港的追隨群體，繼續在香港進行有限

⁶³ Memorandum to Mr. Barrett, Mr. Allison, 7 December, 1951, 350.2 *Third Force (1951)*,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U.S.—China Relation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Collection.

⁶⁴ “Extract from letter of June 4, 1952 from Dr. Kan Chieh-hou”, 350.2 *Third Force (1952)*. 195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Collection.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States).

度的隱蔽性政治活動。他們既以反共為其活動目標，同時也以加入國民政府參與執政為目的。事實上，兩者並不矛盾，反而十分符合美國及蔣介石政府的期望與利益。基於這種發展方向，留港第三勢力餘黨一方面參與了由中情局在背後推動的香港 MRA 運動，繼續他們的在地社會活動。另一方面，他們藉着參與 MRA 在歐美、日本與東南亞舉辦的會議，增加了與美國、日本、臺灣甚至其他國家政治領袖的交流機會。

張發奎在他個人口述自傳中闢有專門章節，談及他參與 MRA 活動的經過與感受。他認同道德重整能夠恢復人們的「良心」的宗旨——他感覺「許多人的良心淪喪了」，他固然希望加入這場運動「改變我自己」，但同時更指出：「我的興趣在於該運動的反共立場，它的反共原則同我的思想是一致的。」⁶⁵

根據張發奎的口述傳記，一些在港第三勢力人士，他們同時也是 MRA 香港分會的參與者。他們的名字，不少均曾出現於《華僑日報》、《工商日報》這類流行報刊報導 MRA 的新聞版面上。這群人的名單，⁶⁶ 可以總結如下：

姓名	曾任國民政府官職 / 政黨	在港職業
張發奎	前陸軍總司令及第四戰區司令官	在港創辦大同書院，與顧孟餘同為香港第三

⁶⁵ 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回憶錄》（臺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7），頁 774-776。

⁶⁶ 有關「名單」中的第三勢力人士或生平介紹，他們在 1950 年代中期的在港經歷，諸如張發奎、童冠賢、李毓田等等參與的活動、身份角色，除了參考張發奎的回憶錄外，本文還參考了 MRA 官方刊物 *New World News for Moral Re-armament* 以及陳正茂編著，《50 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秘》，頁 126-127；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頁 230-260 的相關研究。

		勢力主要領導人。
李毓田	北京出生，日本九州帝國大學(The Imperial Kyushu University, Japan) 政治經濟科畢業、日本問題研究專家，曾任汪精衛秘書、1940年代曾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參事兼教育處主任秘書、國民政府外交部研究室主任及國民參政會參政員。MRA 刊物特別指出他在抗日戰爭期間，曾有六年與毛澤東、周恩來同期擔任國民政府的「國民大會代表」。 ⁶⁷	在港期間出任光夏書院信託人 (trustee；該書院的前身是上海大夏大學，李氏曾任該校教授) 及大華書店顧問，另於新亞書院任教；第三勢力成員及在港汪派人員。李毓田是MRA香港分會的核心成員。
童冠賢	1948年當選中華民國立法院長；在港桂系人員。	1950-1965年任職於崇基書院，第三勢力領導人之一。
陳克文	大陸時期曾任行政院參事、立法委員、立法院秘書長。	在港期間任教於胡素貞創辦的聖保羅女書院；第三勢力核心成員，負責財政事宜。
張君勱	曾任馮國璋總統府秘書長；國民政府國防參議會及國民參政會議員，民主社會黨領袖，名列中共戰爭罪犯名單。	與張發奎、顧孟餘及童冠賢等人1952年在港組織第三勢力核心團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

⁶⁷ 文章指出：“For six years he was a Senator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Mao Tse-tung and Chou En-lai were Senators at the same time.” *New World News for Moral Re-armament* 23:17 (22 February 1975).

王同榮	曾任國民黨籍國大代表；國民黨特工 68	在港任第三勢力刊物《聯合評論》週刊社務委員。
劉裕略	民主社會黨在港核心成員。	第三勢力主要刊物《聯合評論》的執行編輯。

上述第三勢力群體中，以張發奎及李毓田最為熱心參與 MRA。他們是「世界道德重整運動香港協會」的代表人物。他們本身作為有軍政聲望的政治難民的身份，於 MRA 高層而言也是具吸引力的。透過他們，MRA 有機會為二百萬在港難民所認識。張發奎也讓布克曼的親密追隨者 Stan Shepherd 轉達了以下訊息：他本人為了 MRA 進入數以百萬難民群體是盡心竭力的，他急不及待地期盼能夠印製更加多的 MRA 文字作品，並期待 MRA 世界大會能夠差遣二至三人到香港協助開展工作。⁶⁹

除了上述張發奎、李毓田等人外，還有一批出任國民政府職務的軍政人員或南來辦學知識份子：

姓名	曾任國民政府官職 / 1949年前職稱	在港職業
余兆麒	前國民政府陸軍中將；曾於張發奎麾下，任第四戰區駐香港代表	香港中國聯合銀行總理兼國民旅行社董事

⁶⁸ 張發奎也特別指出從雷震(1950年代初出任「《香港時報》管理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那裡獲悉，王同榮的真實身份是國民黨調查局的特務。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回憶錄》(臺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7)，頁 690、743。

⁶⁹ “Letter, Stan Shepherd to Frank N. D. Buchman, 25 Jul, 1958,” *Archive of the Oxford Group*, MS Oxford Group 3/139.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局主席
林翼中	曾出任國民政府廣東參議會議長兼監察院監察委員	香港珠海書院校監； 香港崇正總會理事長
唐惜分	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秘書	香港珠海書院校長、 美國亞洲基金會轄屬 孟氏基金會圖書館館 長；1952年國民黨第 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香 港總支部三名代表之 一；另一名為馮海潮
凌道揚	於1916年與胡惠德、胡素貞兄妹認識 布克曼；曾任國府廣東省建設廳農林 局局長、聯合國糧食救濟總署廣東分 署署長、美國聯合國糧食農業總署官 員、1948年退職來港。	1948年返港，1955年 出任由香港基督教宗 派合辦的崇基學院的 校長；1960年任聯合 書院校長。1950-1960 年代同時兼任新亞書 院校董；1957年獲美 國馬薩諸塞大學頒授 榮譽法學博士銜
蔡貞人	曾任國民政府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企業家。香港新亞書 院創校校董、募款委 員會主席
王裕凱	早年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曾任私 立復旦大學教授，私立上海聖約翰大 學教務長	香港光夏書院(由上海 大夏大學改建)院長、聯 合書院創校委員、香 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文學院院長
丁文淵	國民政府前外交官兼同濟大學前校長	先後任教於珠海書院、新亞書院，《前途》創辦人，任香港中國文化協會主任委員
馮海潮	國民黨黨員，1946年籌組國民黨在港外圍組織「港九工團聯合總會」，1948年9月任成立大會主席團主席，並獲選為常務理事。1949年任國民黨香港總支部常務委員	(國民黨在港外圍組織) 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秘書長；1952年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香港總支部三名代表之一；1950年代中後期任香港政府勞工顧問委員會工人代表。
陳能方	不詳	光夏書院創辦人之一，聯合書院校董兼香港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主席
邵光	不詳	香港《榮友》月刊社社長，聖樂院院長(即今「香港音樂專科學校」)，香港盲人音樂訓練所主任
周振勇	不詳	香港大學東方文化學院教授

上述群體中，以凌道揚、余兆麒、王裕凱、蔡貞人、馮海潮數人較為熱心的 MRA 參與者。他們曾多次參加 MRA 的國際活動，也曾經多次帶領香港的青年學生遠赴美國和瑞士的總部交流。

我們必須補充的是，從英國外交部檔案所見，香港第三勢力的核心人物群體，有一份未被學界注意的余兆麒(1902-1996)名單。這份名單源於曾派駐中國的英國軍官 Lt. Col. R. V. Dewar-Durie (Durie；1905年出生；1949年任英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é in Nanking])與余兆麒的會談記錄，該記錄於1951年5月21日呈交至英國陸軍部(The War Office)。Durie 與余兆麒會談後，便向英國當局匯報余兆麒的反共反蔣思想與第三勢力在香港的政治活動，並且列出第三勢力在香港的核心人物(The Cabinet or inner circle of the 3rd Party)。依次是：(a)許崇智(1887-1965)、(b)張君勱、(c) C.T.(?) Wang (可能是前外交部長、前駐美大使王正廷)、(d)余兆麒。會談中，許崇智被看作是傀儡，張君勱與 Wang 將會離港赴美；而李宗仁反而成為不入流的角色。⁷⁰

不過，在英國陸軍部的 A.S. Campbell 眼中，余兆麒的會談記錄不足取信。⁷¹ 1950年代中期以來的在港第三勢力餘部，他們已經很難在政治及軍事上有所為，同時也未必能夠為美國提供什麼樣的機密情報。但是，他們透過 MRA 這項隱蔽性的宗教與思想的心理戰略方案，在香港文教界別進行的宣傳工作，還是發揮了一些「爭取人心」的作用。目前，我們仍未能掌握美國政府當局如何評價 MRA 在香港的文化冷戰戰績，故較難具體地總結 MRA 的運動成效。事實上，思想及意識

⁷⁰ Lt. Col. R. V. Dewar-Durie to The War Offic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TNA, *Record of Foreign Office*, 21 May, 1951, FO371/92223.

⁷¹ A.S. Campbell (from War Office), "A brief Summary of a Conversation which Lt. Colonel R.V. Dewar-Durie had with Mr. S.K. Yee in Hong Kong with regard to 'The Third Party in China'," June 13, 1951, FO 371/92223.

上的潛移默化並不太容易作出量化計算。這一切本身也與 MRA 作為隱蔽性的意識形態戰爭、文化心理戰定位息息相關。這點正好反映了 MRA 香港協會在香港的在地化耕耘，能夠因應香港的地緣政治與在地社會管控，少談政治、只着力於推動社會文教發展的工作。

基本上，MRA 香港協會在政治上保持低調與中性立場、不作公開政治活動、不違反港府禁令。因為如此，致使余兆麒，還有其他比余氏更為積極參與 MRA 活動的核心人物，都沒有引起英國或港府情報部門對 MRA 的調查。MRA 在向香港警方註冊成為合法活動團體的說明文件中，表示它只是一種「結合不同宗教思想」的意識形態，強調它某程度上是相同於中國儒家所宣揚的精神及教導。它的組成及相關活動形式主要是：第一，由數名英國人與加拿大人在家中舉辦的家庭活動(house party)，遵守上帝的旨意；第二，提倡遵守四大絕對的道德準則，彼此團結及互助，消除因為國籍、種族、階級與宗教教義產生的分歧；第三，透過改變自我以實現重建世界的理想。相關文件還指出，在香港推動道德重整運動，不但不會傷害香港社會，還會為香港帶來極大幫助，使香港社會減少爭吵與爭鬥。基本上，MRA 在香港的定位可以理解為——推動社會文化教育、促進宗教融合以及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⁷²

李毓田是 MRA 香港協會負責日常實務工作的核心人物。⁷³ 從

⁷² 相關文件見於 MRA 香港分會代表李毓田向香港警方呈交的解釋信函 Lee Yu-tiam to Mr. White (Registrar Officer, Police Headquarters, Hong Kong), October 8, 1954. *Moral Re-Armament*, CP/SR/19/01365, HKRS590-8-1672. (香港政府檔案處)，下文也將會對 MRA 註冊的過程有所論述。

⁷³ 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回憶錄》，頁 776；*Moral Re-Armament*, 30 March, 1955, HKRS590-8-1672；〈道德重整運動在港擴大進行〉，《工商日報》，1955 年 7 月 12 日。從報刊裡，還可以看到一些參與 MRA 的人士，但目前未能查到這些人士諸如葉天生、陳之楚、馬次

1955 年至 1976 年的逾二十年裡，他都十分低調地推動會務，很少就 MRA 的發展接受報刊媒體的訪問。根據 Stan Shepherd 寫給布克曼的信件裡，我們可以了解到張發奎是通過李毓田的介紹才加入 MRA 的。⁷⁴張發奎則因為他本身在軍政界的崇高聲望與影響力，故在 1950 年代中後期的 MRA 活動中儼如扮演召集人的領導角色。

據張發奎所言，李毓田早期還與劉裕略、王同榮等人為 MRA 香港分會編輯及出版《仁報》。⁷⁵直至 1976 年，胡素貞呈交香港警方社團事務處的文件中，仍然顯示李毓田及其長子李文浩是香港分會的五名共同負責人之一。⁷⁶後將會詳細提及 MRA 影響力巨大的 *Black and White* 一書，其中文版《黑與白》便由李文浩譯寫。由此可見，李毓田應是 MRA 香港分會繼胡張之後較為重要的人物。至於李毓田與世界道德重整運動接上關係，按其自述，則是得力於第三勢力的另一名領袖張君勳的聯繫，使他獲得時任港區 MRA 負責人司徒約翰的引介，加入 MRA 的香港小圈子活動，出席家庭小組的聚會、「遍讀這運動的大部份書刊」。⁷⁷李毓田描述了當時參與聚會的情況：「聽取世界各地代表過港時發表的各項報告，他們經常報告世界各地這運動的動態，以及個人如何改變的經過。我則報告

騏、王惕亞等等的生平資料，故在上文表格裡也就從略介紹。(有關人名見於〈道德重整會同人歡迎會議歸來代表，邵光述受到很大的感動〉，《華僑日報》，1958 年 4 月 12 日。)

⁷⁴ “Letter, Stan Shepherd to Frank N. D. Buchman,” 25 Jul, 1958, *Archive of the Oxford Group*, MS Oxford Group 3/139.

⁷⁵ 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回憶錄》，頁 690、743。

⁷⁶ F. Catherine Woo, M.B.E., JP to Registration of Societies, Societies Registration Offic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29 June, 1976, HKRS950-1-582.

⁷⁷ 有關李毓田及李文浩父子如何投身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如何為 MRA 香港分會工作，MRA 位於倫敦的官方刊物《新世界新聞》(*New World News for Moral Re-armament*, Vol.23, no.17, 22 February 1975.) 有詳細報導。

中國儒家、墨子的學說。」⁷⁸

隨着對 MRA 認識越多，越受其精神感召，李毓田把 MRA 的精神理念、目標方向、思想主張以及它在世界各地的活動情形與成果匯集成書出版，詳細地向華人社會介紹 MRA 發展的來龍去脈。他的這部書稿撰成後寄送至身在瑞士總部的胡素貞修改，並蒙其譯寫英文擇要，再轉呈布克曼等人審閱。該書最後以《到光明之路》為名，於 1954 年中旬正式出版。同年的 11 月，李毓田把專書內容的部份文章命以〈危險時代一線曙光，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專欄，連續十八天刊載於《華僑日報》。在他筆下，MRA 信奉的上帝被比附為中國傳統文化上的天道；MRA 的默禱或上帝啟示，在他看來與儒家思想的「致良知」反省工夫毫無二致。⁷⁹ MRA 的瑞士訓練中心，則儼如人間天堂，更是改造個人及世界的神聖領域：

凡是到了這地方的人，一切不乾淨的念頭都須收起，準備革面洗心，從新做人……它的最主要任務是在互相砥礪，敦品勵行。

在柯峯懺悔、認錯、賠罪、道歉，已養成一種特殊風氣。⁸⁰

柯峯所代表的正與莫斯科完全相反，那便是絕對的誠實、絕對的純潔、絕對的無私、和絕對的愛。……彼此相見都會把國別、種別、民族別、階級別，所有一切舊觀念，統通一筆勾銷。因此，德國人與法國人握

⁷⁸ 李毓田，《到光明之路》，頁 12。

⁷⁹ 李毓田，〈道德重整運動與中國傳統思想——歡迎道德重整話劇團蒞港〉，《香港工商日報》，1958 年 4 月 19 日，第 6 版。關於李毓田用儒家思想解釋 MRA 的道德教導，或者是用 MRA 的四大絕對道德標準闡揚儒家思想，受到了 MRA 世界大會的肯定，大會於官方刊物介紹了李毓田的見解以及他祖孫三代人參與 MRA 的事跡。New World News for Moral Re-armament 23:17(22 February 1975).

⁸⁰ 〈危險時代一線曙光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六)，《華僑日報》，1954 年 11 月 29 日，3 張 3 頁。

手了，日本人與英國人握手了，英國人與南非人握手了。⁸¹

李毓田在出版專書及刊文宣揚 MRA 的同時，也聯同司徒約翰及蘇達立致信香港警方，闡述 MRA 的活動理念，申請把「世界道德重整運動香港分會」註冊為合法社會團體。⁸² 根據香港警方文件，MRA 香港分會於 1955 年 6 月 30 日正式獲批成立。⁸³ 香港分會的總參與人數，因沒有檔案可供稽查而難以估計。雖然目前仍未找到香港 MRA 分會的會員檔案，但根據張發奎的《傳記》所說，該會活躍成員有三十多名；大多數都是由大陸出來的商人、文化及教育界人士。⁸⁴

MRA 香港分會大體上延續「世界道德重整大會」的傳統，沒有入會手續，整體組織形式看上去是鬆散的，參與者似乎也只是全憑共同的理念而聚散。布克曼所宣稱，「道德重整運動歡迎一切人參加——你用不着入會，也不能退出，這只是一種日常的生活」的原則。⁸⁵ 胡素貞接續其論，闡釋 MRA 並不以某種制度化的「會」的形式面世，彼此不需經過一套入會、退會的程序或手續。凡認同四大絕對道德的理念、共同解決社會紛爭以「共謀世界和平」的，便是他們的同道。⁸⁶ 如前所論，「共謀世界和平」，本身就是「美國心理戰略委員會」或

81 〈危險時代一線曙光 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八)，《華僑日報》，1954 年 12 月 1 日，3 張 3 頁。

82 Lee Yu-tiam to Mr. White (Registrar Officer, Police Headquarters, Hong Kong), October 8, 1954. *Moral Re-Armament*, 香港歷史檔案館，HKRS590-8-1672。

83 The Societies (Registration) Rules CAP 151. (Rule 3), *Moral Re-Armament*. (M. R. A) (Oxford Group), *Moral Re-Armament*, 66, 香港歷史檔案館，HKRS590-8-1672。

84 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回憶錄》，頁 776。

85 卜克滿，《改造世界》，頁 33。

86 〈道德重整運動四目標 絕對真誠純潔無私及博愛 胡素貞盡力服務此項運動〉，《華僑日報》，1955 年 4 月 2 日，3 張 4 頁。

後來改組的「行動協調委員會」所要宣傳、塑造的美國式的「和平」，並由此構成反映美國利益的「普世價值」。

四、道德重整運動在香港的工作與發展

(一) 港府的政治管治與 MRA 的隱蔽性推進

MRA 是一場帶有宗教精神的政治運動，清晰指明要用它的超級意識形態壓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在香港的宣傳，巧妙地運用文化冷戰的「隱蔽性」宣傳形式，進行猶如艾森豪所說的從心靈與意志上影響人們的「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⁸⁷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它在香港發展工作，並沒有一如它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那樣高調顯示是美國資助的運動；⁸⁸ 同時，它也沒有如臺灣那樣清晰而高調地宣傳反共、反攻大陸的意圖。這與英國不願美國過多介入香港社會有關，目的是不欲招致北京對港英政府「顛覆中共」的控訴。英國因而對美國的「冷戰戰士」諸多限制，使他們難如其願地在港實施冷戰活動。⁸⁹ 英國在港實行的「去政治化」或「政治中立」管治策略，反過來讓左、中、右或第三勢力的活動都難以開展。

縱然第三勢力主動迎合美國的冷戰方針，亟欲尋求華府經費資助，在港實現「反攻大陸」的政治運動，但也因為在上述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港英政府對第三勢力採取嚴密監視的措施，更強行將之取締。在

⁸⁷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148.

⁸⁸ *Foreign Reaction to the MRA Play the Vanishing Island*, 14 September, 1955, CIA-RDP78-02771R000300250002-7.

⁸⁹ 有關英國在冷戰時期既依賴美國，但又處處防範美國政治干預香港事務的研究，可參見麥志坤，《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一書的論述。

這種情況下，第三勢力被逼把活動陣地轉移至日本。⁹⁰ 然而，因為參與 MRA 的緣故，留港殘餘群體還能夠保留一些發展空間。只是，得以在香港社會公開活動的 MRA，也因為英國的治港政策所限，很少政治活動或公開政治宣傳，純粹以提倡道德教育的文化組織與宗教團體的面貌示人。它特別是透過倡導復古的道德觀念與文教意識，顯示它與共產主義的激進主張的差別。塑造「文化中國」，樹立傳統、純樸的德性生活模式，建立開放、自由的心靈，這種非激進化的思想重建，在瓦解共產主義的影響力上與 PSB 或 OCB 旗下其他以「文化」為行動武器的冷戰項目異曲同工。胡素貞、李毓田在宣揚 MRA 時，談得最多的是儒家的傳統道德思想觀念的重建問題。他們很少在報刊訪談或文章中，用激烈的言辭或行動反對共產主義。香港的 MRA，整體上異於自詡是「自由中國」的臺灣那種以「反共抗俄」為主調的政治化 MRA 運動。自 1950 年代中後期以來，曾任剿共司令的張發奎，他在香港一域甚少公開反共。即使是主持孫中山誕辰紀念的千人盛典、雙十國慶，他也很少政治呼籲；偶有為之，也是點到即止。⁹¹

1958 年，布克曼及其核心追隨者希望張發奎能出席世界道德重整大會。但張發奎十分謹慎，他雖然渴望赴會，但擔心向港府申請離境與會，將引起當局注意——因他曾向港督承諾不參與政治活動，致使猶豫不決(hesitant to apply for permission to attend an MRA Assembly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不過，與張發奎見面的 Stan Shepherd，當即向他保證一切不成問題。⁹² 最後，張發奎於 1960 年至 1961 年離港一年，遠赴歐美

⁹⁰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頁 230-260。

⁹¹ 〈港九各界人士今晨在樂宮戲院祀飲國父百年誕辰 大會主席張發奎將軍致開會詞稱中共機起義飛臺係最佳祝賀禮物〉，《工商晚報》，1965 年 11 月 12 日。

⁹² “Letter, Stan Shepherd to Frank N. D. Buchman,” 25 Jul, 1958, *Archive of the*

參加 MRA 大會。然而，當張氏到達歐美時，毫無顧忌地公開宣揚其政治立場，並進行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動。他出席各種場合，向旅美華僑作政治呼籲，要他們響應國民政府反攻大陸、消滅中共的號召。⁹³ 當他回港後，根本沒有類似場合供他這種受港府監視的人物作政治宣傳。他只能在私人信函中表達政治立場與想法；他致信布克曼，感謝他兩次親自在瑞士柯峯招待他與何應欽，他宣稱奉布克曼之言為真理鐵律，亦矢志竭盡所能地推動 MRA 運動，堅決保衛香港人(Hong Kong People)，使他們不受共產主義影響。正是出於要振興 MRA 運動的在港戰鬥能力，他向布克曼提出要調派在歐美 MRA 總部的胡素貞回港的請求，請她在港主持大局。⁹⁴

不論是張發奎還是胡素貞，他們在香港如涉及中共的相關討論時，較多關注的都是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狀況問題，提出的論調相對地溫和：「自由世界以和平方面影響到共產主義，使其思想形態有所改變。」⁹⁵ 胡素貞認為道德重整運動的真正目的是要消弭世間仇恨，只要努力地宣揚，當 MRA 能夠「在這個世界伸張起來以後，共產主義就會消滅」。⁹⁶ 他們相信，透過宣揚 MRA 的宗旨與理念，並將之有效地在

Oxford Group, MS Oxford Group 3/139.

⁹³ 〈張發奎在美國說 在蔣總統領導下為光復大陸奮鬥〉，《華僑日報》，1960年10月13日；〈紐約僑團歡識張發奎一致促其復出協助復國大業〉，《華僑日報》，1960年11月3日；〈張發奎在紐約談 反攻大陸有望〉，《華僑日報》，1960年11月17日；〈張發奎預料中共崩潰為期不遠〉，《工商晚報》，1961年1月11日。

⁹⁴ *General Chang Fat Kwei to Dr. Frank N. D. Buchman*, MS. Oxford Group 3/33, 22 June, 1961.

⁹⁵ 上述之言是邵光代表香港出席菲律賓「世界道德重整運動」亞洲區會議返港後，舉行記者會匯報成果時的講辭，見《華僑日報》，1958年4月1日。

⁹⁶ 〈本港教育家胡素貞博士談世界道德重整運動〉，《香港工商日報》，1962

學校及社區實踐，便能夠影響青少年的人生價值，改變他們的文化與生活模式，如此便能發揮抗衡共產主義擴散的作用。重建傳統中國文化價值便等同於區隔共產中國，甚或以復古為解放的手段對照共產中國的諸種問題。這種隱蔽式的曲線反共取徑，相信也與港英政府的管治政策有關。

1950年代中後期，難有實質政治成效的第三勢力在港份子，雖然已經不易再向美國領取資金經營政治，但 MRA 的活動讓他們重拾活動的機會，能繼續與美國、日本保持聯繫，並有了另類渠道獲得資金前往美國、歐洲、菲律賓、印度與日本諸地參加活動，同時也有了新的名目在港成立一個國際化的迎來送往平台——不僅接待外國來訪 MRA 代表，還有了出入香港本地文教機構的憑恃，選派青年才俊參加國際交流和培訓。他們藉此也可與香港本地社會不同階層民眾接觸，透過報刊、影視媒體、印刷品、國際交流、校園工作、社區活動的宣揚與推廣，在廣泛宣傳 MRA 的行事理念，也讓已處邊緣位置的自我與世界反共潮流同步邁進，延續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於是，第三勢力的部分人士，就這樣一方面立足於香港社會響應、實踐 MRA 世界大會的宗旨，另一方面積極關注本地社會的各種文化教育與道德倫理建設問題。

(二)MRA 在香港的社會傳播與方式

1. 積極面向社會：善用媒體宣傳及報導大小活動

MRA 於香港未正式註冊為合法組織前，活動不多，主要是李毓

田所說的家庭聚會或內部成員工作宴會、召開記者會宣傳 MRA。自 1955 年，MRA 香港分會正式向港府註冊，公開活動逐漸增多。但這些活動大多都是在註冊條例監管下，以改善香港在地社會問題為主。戰後香港從轉口港、貿易港過渡至工業中心、美軍休整及娛樂中心，在這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四面八方的人南上北下、東往西來，各種服務行業與觀光行業蓬勃，使香港社會深受黃、賭、毒及貪腐問題困擾。MRA 在港自覺要加強「道德」教化的倡導工作，遂透過《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等親國民黨報刊引發輿論關注，期盼掀起「反色情運動」、「反毒品販賣運動」。他們透過報刊宣傳香港社會要加強儒家的孝順觀念與恢復傳統文化，並透過舉辦母親節徵文比賽及演講比賽，舉起「重整道德運動」的大旗，同時也着意讓社會不同階層的人認識 MRA 的精神與宗旨。⁹⁷

MRA 借助報刊發表成員們針對本土社會問題進行的文章分析、演講稿，並熱衷於召集記者開會發布消息，宣揚成員們在歐美的與會經歷，將 MRA 的世界大會最新資訊廣泛傳佈。舉例說，胡惠德於 1951 年 8 月以香港代表的身份出席在美國舉辦的道德重整會議。他返港後接受報刊訪問，傳達了三層訊息。第一，日本代表為發動戰爭，向其他國家代表致歉；第二，會議上的白人代表向黑人代表致歉；第三，

⁹⁷ 〈人性與反人性鬥爭，反色情運動展開，盼各界聯同制裁色情誨淫讀物，目的在重整道德挽救社會頹風〉，《香港工商日報》，1956 年 7 月 2 日，2 張 1 頁；〈反色情運動展開，建議各界聯同制裁色情讀物，合力重整道德挽救社會頹風〉，《華僑日報》，1956 年 7 月 2 日，2 張 1 頁；〈灣仔街坊福利會舉辦重整道德運動公開徵文辦法〉，《香港工商日報》，1961 年 1 月 17 日；〈各街坊會禁毒徵文，名次經已評定公布，灣仔坊會重整道德徵文名次也揭曉(一)〉，《大公報》，1961 年 2 月 6 日；〈闡揚孝道重整道德，各界祝母親節，分別集會送禮，演講徵文〉，《香港工商日報》，1960 年 5 月 8 日。

與港督葛量洪見面，向對方送上 MRA 第二號人物霍華德著作《看見世界》(The World Rebuilt)。⁹⁸

香港的地利及自由營商環境，不但有利於香港分會的成員在國際穿梭往來，也利便大批國際 MRA 參與者過境公務。譬如在 1952 年，參與 MRA 活動的六名日本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日本國會議員等政商代表聯同美國的代表過境訪問香港，訪談香港政商界別人士。⁹⁹類似以 MRA 名義返往日、臺以至菲律賓、泰國等地，同時再順道過境香港訪問的做法，於隨後的十數年間常見及。如三井家族的總領家第十代當主三井高維及其女兒三井英子、千葉三郎(日本勞動大臣、眾議員)與在港成員見面，並到專上學院演講，宣傳 MRA 理念與世界各地青年動向。¹⁰⁰這些涉及 MRA 國際會友的訪港交流活動，香港的報刊都有不少報導。由此，反映 MRA 重視利用報刊媒體散佈理念，引起社會注意；同時，也可以看出 MRA 香港分會與在地媒體有不少合作的關係。

每當成員們外出交流前後，分會多會召集成員舉行迎、送宴會，報告行程與分享出遊體驗，而《華僑日報》、《香港工商日報》在隨後一兩天也會作相關的活動報導，並跟進一些活動的進行情況。1955 年 10 月，司徒約翰夫婦出席瑞士柯峯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大會返港，香港的成員為其舉行歡迎會，出席者有凌道揚、蘇達立、李毓田等十

⁹⁸ 〈胡惠德瑞士歸來談歐美有新藥治癌症 道德重整會議日代表自承錯誤〉，《華僑日報》，1951 年 8 月 29 日，2 張 2 頁。

⁹⁹ 〈出席道德重整會議，美日代表昨日過港〉，《香港工商日報》，1952 年 10 月 25 日，頁 6。

¹⁰⁰ 〈出席道德重整會議，日代表團過港〉，《華僑日報》，1952 年 10 月 25 日，2 張 1 頁；〈道德重整會代表昨訪問工團總會〉，《華僑日報》，1953 年 11 月 08 日，4 張 1 頁；〈千葉三郎抵港訪問〉，《華僑日報》，1959 年 1 月 7 日，2 張 1 頁。

餘人。凌道揚致歡迎詞後，司徒約翰報告會議經過，分享了數十國的代表出席大會情形、非洲代表如何編排名為「自由」的戲劇，大會進行經過等等。¹⁰¹半年後，司徒約翰夫婦再度出席瑞士大會，返港後同樣於歡迎會上講述經歷。他指出各國代表如何為自己的國家在近代史上曾為別國造成的侵害，主動向對方致歉求原諒。司徒夫婦提及中英關係時，聲淚俱下地向與會的中國成員深表歉意。另一名英籍成員蘇達立，當下表示要就「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英關係」向中國道歉。MRA 的這些活動或事例，都透過報刊而得以在香港社會傳播。¹⁰²

透過報刊，我們也得以了解到，MRA 的核心成員與美國及其盟友國家的互動情況。崇基學院校長凌道揚以 MRA 之名訪美返港，分會會友設宴歡迎。出席宴會的成員有外藉醫生蘇達立，國民政府外交官兼同濟大學前校長丁文淵(1889-1957)以及其他在港前第三勢力成員童冠賢、張發奎、李毓田、王同榮、劉裕略，另外還有其他宗教界、教育界與工業界成員如周振勇、張名馨、葉天生、馮海潮、馮少田等十數人。主持會議的張發奎，轉達英國華士頓將軍出席 MRA 世界大會後抵港晤談之事，提出香港要積極開展 MRA 工作。凌道揚則向會眾報告在美國麥肯尼島參與 MRA 世界大會經過，他分別拜見時任副總統尼克遜(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時任約翰霍金思大學校長、總統艾森豪之弟密爾頓艾森豪(Milton S. Eisenhower, 1899-1985)。是次晚宴還有兩項議案，討論在港推動 MRA 運動的方法，為瑞士 MRA 世界大會推選出席代表。¹⁰³

101 〈司徒代表歸來報告 道德重整大會經過〉，《華僑日報》，1955 年 10 月 30 日，3 張 2 頁。

102 〈出席世界道德重整會歸來 司徒約翰夫人報告開會經過〉，《華僑日報》1956 年 3 月 14 日，3 張 1 頁。

103 〈道德重整運動同人歡宴凌道揚尹致中〉，《工商日報》，1957 年 8 月 4 日，

1958年4月，邵光、蔡貞人、周振勇等人參加了在菲律賓舉辦的「世界道德重整亞洲國家代表會議」，回港時，張發奎夫婦、凌道揚、馮海潮、劉裕略、葉天生、陳之楚、馬次騏、王惕亞等成員為之舉辦歡迎宴會。¹⁰⁴ 1958年6月至9月，李毓田與任職香港大學的周振勇以及「港九工總」領袖馮海潮，¹⁰⁵ 遠赴美國密歇根州 MRA 總部，出席「世界道德重整運動 11 屆高峰會議」。

基本上，在 1950 年代中期以來，MRA 香港分會與歐美總部、作為亞洲總部的菲律賓，彼此有密切的互動與交流。1960 年代初開始，亞洲總部的角色漸漸轉移至後來居上的日本。1962 年，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聯同戰後數名首相、日本國會領袖與財閥家族，在東京小田原籌建道德重整運動大會亞洲總部及訓練中心。自此，MRA 香港分會與日本的來往便更趨頻繁。成立當日，胡素貞籌款百萬日圓作為資助，並與香港多名成員前往小田原出席開幕典禮。¹⁰⁶ 他們分別有張發奎夫婦、余兆麒、曾昭憲、朱嘉理、潘頓。同樣，香港的報刊也報導了日本中心的開幕盛況，並報導了有關代表的行程。¹⁰⁷ MRA 把香港的成員與美國、日本等地的政治人物、紳商領袖聯繫了起來。MRA 成員習慣性地在報刊宣揚出國大小交流活動，也很公開透明地向外發布其各種在香港啟德國際機場舉行的送迎記者會、成員宴會，這些不但有助於向社會大眾宣揚 MRA 的理念，也光明正大地向港府當局展示他

頁 6。

104 〈道德重整會同人歡迎會議歸來代表，邵光述受到很大的感動〉，《華僑日報》，1958年4月12日，2張1頁。

105 關於馮海潮與國民黨的香港右派工會活動，可見陸延，《異途相逢：勞工運動與香港殖民統治 1938-1958》（香港：中華書局，2022），頁 306。

106 Katie Woo, *Pioneer Education from Hong Kong*, 35

107 “H. K. Group to Attend M. R. A. Assembl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1 October, 1962.

們的活動情況。

然而，上述的不少活動都是較為單方面地向社會介紹 MRA，而胡素貞在 1962 年奉命重回香港推動 MRA 時，所舉辦的影片觀賞及分享會，在當時社會不失為一種較具吸引力的多元宣傳方式。她邀請社會不同階層人士出席，並圍繞改造社會貪污腐化壞風氣為電影反映會的主題，這便十分針對性地回應 1950-1970 年代從公務員、紀律部隊到一般庶民社會屢禁不止的貪污惡行。第一部在港公映的影片是胡素貞曾參與的舞台劇電影「崇高的經驗」(The Coming Experience)，它於 1962 年剛成立的「香港大會堂」上演，是胡素貞回港暫居的第一場面向社會大眾的大型活動。首映禮上，出席者眾。據《道德重整運動通訊》所說，出席者包括著名商人、教育家、外交使團成員和香港紅十字會主席。¹⁰⁸

以影像、文藝表演及充滿互動的交流會，藉以促進青年人道德改造的做法，這種多元、先進而活潑的方式，在面向教育「阿飛」(不良青少年認識自己的人性惡習、重上正軌的工作上，¹⁰⁹ 無疑會比傳統說教更具吸引力。利用電影放映以輔翼 MRA 理念的傳播，在隨後的 MRA 教育活動裡被更廣泛使用。MRA 也能敏銳捕捉新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普及化與影響力，並與各國的電視台合製宣傳節目。1970 年，MRA 在香港便已透過音樂劇的形式，在電視上向大眾播放音樂劇。為 MRA 攝製及播放節目的，是香港首家供公眾免費收看的無線電視台(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TVB；於 1967 年創立)。該節目全片時長 56 分鐘，由來自 21 個國家的青年參與演出，向香港市民宣揚 MRA 追求世

108 "News in Brief: In Hong Kong," *MRA Information Service* 11:269 (9 June 1962): 16.

109 〈胡素貞博士提出四項感化亞飛辦法，積極宣傳道德重整推動世界人性革命(二)〉，《華僑日報》，1964 年 11 月 26 日，2 張 3 頁。

界和平、消除種族隔閡、彌合意識形態分歧、放下戰爭仇恨的主張，彰顯合力創造一個「新世界」的理念。¹¹⁰無線電視是香港 1970 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娛樂媒體，具備巨大傳播力，它讓市民有機會安坐家中收看 MRA 的節目。電視結合報刊、電台以及刊物的流通，這有利於 MRA 進入香港知識界乃至基層社會。

2. MRA 與香港大專學生的國際青年文藝交流活動

承上，可見 MRA 香港分會成員有大量機會離港參與國際思想、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MRA 在港工作固然是在於嘗試改造社會風氣、建立青少年道德倫理價值觀念，但加強香港青少年與海外——特別是美國的交流，認識美國的文化、政治與社會也是文化冷戰爭取人心的重要工作。由於 MRA 本身的國際聯盟性質，讓香港的成員每年得以選派本地青年學生前往美國、瑞士、日本交流，讓他們在冷戰時局下擁有大量的國際交流機會。凌道揚於 1957 年 8 月赴美與會時，隨行的還有大專院校學生。¹¹¹當中，新亞書院學生黎耀童，同時以香港最長壽、最受歡迎的第三勢力陣營學生刊物《中國學生周報》記者身份赴會；該報刊登是次參會人員所見所聞，介紹了 MRA 的運動宗旨與大會主題，認為 MRA 的思想型態會是人類對治由納粹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唯物主義、共產主義造成的各種病痛的精神武器，

¹¹⁰ “Anything to Declare (ATD) in Hong Kong,” *Musical revue by young Europeans and international friends performed 1967 to 1971*, 見 MRA 官方網頁：For a New World, “Anything to Declare (ATD) in Hong Kong,” <https://www.foranewworld.info/material/films/anything-declare-atd-hong-kong>, Accessed 1 February, 2023.

¹¹¹ 周振勇，〈香港學生代表參加道德重整會議〉，《香港工商日報》，1957 年 8 月 24 日，頁 7。

呼籲要重新以道德思想裝備所有國家，化解一切糾紛與溝通東西方民族的隔閡。文章鼓吹 MRA 是一支「新的龐大的國際力量」，在美國不斷地向外擴散及發展下，成為全人類無數國家不同階級的一場運動。

112

基本上，世界道德重整大會讓與會的香港代表感受到，它既提倡合乎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倫理的思想，同時又是批判專制、獨裁意識形態的現代普世價值——並且是由美國推動、擴展至各國各地以化解人類文明危機的一場思想運動。這些特點，本身吻合了《周報》青年編輯及作家群體本身既擁護中華文化，同時又崇尚西方普世價值的思想——以及對提供援助的美國的自由、民主及開放的種種想像。除了凌道揚外，王裕凱、蔡貞人、周振勇等也曾帶領青年學生參加會議及接受訓練。¹¹³

東京小田原中心於 1962 年開展運作後，香港分會在大專院校挑選學生代表出席長達月餘的訓練大會。譬如，新亞書院曾選拔八名學生聯同其他院校學生代表，於 1966 年 7 月 13 日至 8 月 25 日期間參加「道德重整會亞洲訓練中心日本旅行團」，在不用擔心旅費及食宿開支的前提下，他們得以深入體驗別國生活文化，與來自亞洲各地的青年深入交流，接受道德思想的訓練。他們回港後寫成〈東游日注〉的系列長文，把參與活動的經歷、訓練日程與文化交流感受等等連續

112 明霜，〈擾攘世界中的空谷靈音——道德重整運動簡介〉，《中國學生周報》，第 275 期，1957 年 10 月 25 日。

113 〈道德重整會議代表一七六人全不吸煙飲酒 四大信條與我國儒家教化大致相同 港代表蔡貞人自菲返港〉，《華僑日報》，1957 年 4 月 16 日；〈港道德重整會同人歡宴凌道揚尹致中〉，《香港工商日報》，1957 年 8 月 4 日，頁 6；〈聯合書院王裕凱出席道德重整會〉，《工商晚報》，1959 年 5 月 3 日。

多期詳刊於《新亞生活》。¹¹⁴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中大學生在 MRA 的訓練營接觸到的資訊或者是他們的所感所想，與十年前參與美國 MRA 世界大會的中大學生的比較下，已經沒有多少意識形態對峙的色彩，而冷戰話語及其思想遺緒也不再那麼明顯了。

除了選派學生遠赴歐美、日本參加道德重整運動的會議及訓練外，香港分會還會安排、接待海外 MRA 團體來港訪問及表演。他們邀請和接待來自日本、菲律賓的亞洲青年合唱團在各大專院校與社區公演，同時也成立以浸會學院、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崇基書院及珠海書院學生組成的合唱團以促進彼此交流。合唱團能以中文、越南文、韓國文、錫蘭文、印度文、日文及英文七種語言唱出各國的代表民歌，團員也會與日本、菲律賓、臺灣的合唱團交流及共同互訪公演。¹¹⁵ 這些合唱團主要以日本小田原的亞洲中心為訓練基地。1966 年，亞洲中心效法美國總部的 Sing-Out' 合唱團模式而組成 Let's Go 合唱團。1967 年，亞洲中心成立 MRA 移動學校(MRA 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School)，該校來自南韓、泰國、香港與菲律賓的 150 人，於 1968 年組成 Sing-Out Asia，穿梳美國及亞洲各地公開表演。¹¹⁶

1966 年 3 月，胡素貞及張發奎邀請了「道德重整會亞洲青年合唱團」訪港。合唱團於 3 月 14 日起在香港多所院校演唱，當中包括香

114 曾影翹，〈東遊日注〉，《新亞生活》，1966 年 10 月至 1967 年 6 月。

115 〈道德重整運動劇團專機抵港〉，《華僑日報》，1958 年 4 月 17 日，2 張 1 頁；〈世界道德重整會議，會員五十名明日抵港，將在港獻演英語話劇〉，《工商晚報》，1958 年 4 月 15 日，頁 4；〈道德重整會以會員五十名今日將抵港，明晚在港獻演英語港劇〉，《香港工商日報》，1958 年 4 月 16 日，頁 7；〈世界道德重整會合唱團，用歌唱帶來和平，已安排多項新春演唱秩序〉，《工商晚報》，1967 年 2 月 20 日，頁 1。

116 MRA House ed., *Postwar Japan and the Work of Moral Re-Armament, 40th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Tokyo: Asia Center Odawara, 2008), 47-55.

港大學、聯合書院、新亞書院、浸會書院、珠海書院及皇仁、培英、真光等中學。訪港合唱團共五十多人，這個又名為「六十六進軍合唱團」(Let's Go 66)由日本望族的 MRA 核心成員相馬豐胤、澀澤雅英領隊，由來自日本、臺灣、南韓、南越及意大利等地的青年組成。相馬豐胤表示是次巡演是希望加強各地關係，促進亞洲青年團結及合作，繼而免除饑餓、仇恨和戰爭。¹¹⁷ 1967 年，該合唱團來自世界各地的 40 名成員再度來訪中大，於三所書院巡迴表演及文化交流，呼喚各地青年同心合力共創「另一個新世界」。¹¹⁸

冷戰的武器固然包括了音樂及舞台劇、電影等等，但在 1960 年代中後期多次訪問香港的 MRA 亞洲青年合唱團來看，他們在巡訪東亞、東南亞各地時歌唱受訪國家/地區的民歌，發揮了音樂的另類政治功能與治療作用。透過音樂這種無國際的共同語言，能夠有效打開人們的情感空間，引發熟悉感與被尊重感，使曾經敵對關係的各方產生同感共鳴，進而引發內在情感層面的快樂與興奮，發揮出音樂追求和諧、陶冶性情與德育教化的作用。¹¹⁹ MRA 深刻體驗到，音樂或歌劇能讓人產生興奮、快感與歡樂，有助於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化解因戰爭仇恨種下的敵對感、糾結感與疏離感，進而為建立友誼、促進真正的和平共處提供力量。

姑勿論 1960 年代中後期的 MRA 背後仍保留了多少的「爭取人心」的文化冷戰理念，¹²⁰如 1960 年代後期的 MRA 歌唱團唱頌受訪國

117 〈道德重整會亞青合唱團，今天起演唱〉，《工商日報》，1966 年 3 月 14 日，頁 5。

118 〈道德重整會訪問本校〉，《新亞學生報》，總第 25 期，1967 年 3 月 10 日。

119 關於音樂、歌曲的政治意涵，特別是它對道德情感培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可參考高婷，《留日知識分子對日本音樂理念的攝取——明治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頁 31-66。

120 有關 MRA 歌唱團訪港及其冷戰含意的論述，另見陳學然、張志翔，〈文化

家、民族的代表歌曲，這種跨國、跨文化的音樂交流，本身也是化解冷戰下的地緣政治對立、意識形態對抗以至民族主義造成的身份割裂、文化認同等等導致的矛盾情感。MRA 的這種反共色彩越趨淡薄的轉變，是由日本的亞洲中心主導，這反映了東亞冷戰氣氛趨向緩和而形塑青年品德情意為目標的新開始。從後冷戰時代反共意識形態逐漸淡薄的角度觀察 MRA 的青年學生活動而言——不論是對戰後到港的其他國家或區域的青年學生還是戰後成長的第一代香港大學生，他們透過國際交流的機會而得以出境遊學，可以與來自各地的青年合辦音樂會、舞台劇，這對於擴闊他們的人生視野及個性成長，毫無疑問是有其正面的價值。¹²¹

3. MRA 推動香港的在地文化教育發展

在公開的社會活動中，MRA 為了敦正社會風氣、提升青少年道德素質為主要的在地工作，推動演講比賽、徵文比賽等公開活動。在孟氏教育基金會舉辦的香港大專校際學術演講比賽中，¹²² 珠海書院

冷戰與「道德重整運動」的意識形態整合(1948-1979)》，《南國學術》，頁 284-286。

¹²¹ 有關 1960 年代中後 MRA 推動青年學生群體的國際交流活動，另見陳學然、張志翔，〈文化冷戰與「道德重整運動」的意識形態整合(1948-1979)〉，《南國學術》，13:2，頁 284-286。

¹²² 孟氏教育基金會是由美國亞洲基金會全資資助，而美國亞洲基金會則是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文化教育機構。關於美國亞洲基金會的美國情報機構背景的論述，請參考：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 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173 (香港，2019.6)，頁 48-56；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頁 127-128，141-142。

學生以〈道德重整運動之重要性〉為講題獲獎。¹²³ 另外一場大型公開活動，是 1960 年 12 月地方組織香港灣仔區街坊會主辦的「重整道德運動」徵文比賽。有關比賽以正人心、厚風俗、發揚中國傳統美德為主題。新亞書院校董蔡貞人當時身兼街坊會的理事及是次活動的主要籌辦人。大會定出三個題目，分別由著名哲學家、新亞書院教務長唐君毅(1909-1978)所擬的〈重整道德方案〉，時任香港孔教學院院長盧湘父(1868-1970)所提的〈孔子學說與現代公民品德〉以及香港大學教授饒宗頤(1917-2018)所提的〈朱子治家格言對我國家庭教育之影響〉。徵文比賽的命題，呼應了 MRA 在香港警方註冊時強調的，關注香港在地文化教育和道德倫理的議題，故不宜揚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宣揚中國儒家傳統的文化教育理想與道德觀念，強調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價值是當時的 MRA 向香港社會傳遞的訊息。

MRA 對儒家倫理道德的公開宣揚，這本身十分符合港英政府在二戰期間被日本打敗後重臨香港執政的管治策略。重光後的港府，較為重視居港華人的文化傳統與固有習俗，比過去表現出較為親民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社會上推廣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觀念，正好抵消國共兩黨政權鼓吹的帶有清晰政治目的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那麼，對於傳統文化的認同與道德倫理秩序的強調，又或者是強化香港華人古代的、抽象的中國人身份，都有助於與現實社會上的左右兩翼的政治切割，特別是以復古為解放的手段去抗衡共產主義的擴散，這些是文化冷戰線上有效而常見的做法。因此，MRA 推動儒家為中心的傳統觀念與文化教育，合乎港英政府戰後在學校課程體制培養新一代「對於中華文化傳承感與認同感」的設想，向華人證明

123 〈「道德重整之重要性」孟氏教育基金辦大專校際學術演講比賽季軍講詞〉，《華僑日報》，1959 年 12 月 14 日，4 張 2 頁。

中國文化與殖民管治並行不悖、彼此之間可以和平共存。¹²⁴ 事實上，香港報刊在 1950 年代中期以來涉及 MRA 報導的，不少都強調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不但把 MRA 的個人修身之道與儒家思想結合，同時也把 MRA 的世界大會宗旨與儒家理想扣連起來，突顯了儒家的仁愛、和平精神與「自由世界」的會通以及彼此共同努力的目標，是如何地高度一致的。¹²⁵

1960 年「重整道德運動」徵文比賽，共有二百多份參賽作品。負責評審工作的，除了 MRA 成員蔡貞人、李毓田、凌道揚外，還有唐君毅、饒宗頤、易君左、邱永心諸著名的南來學者。¹²⁶ 對於 MRA 這樣一種以改造社會道德風氣為主題的活動，就連批判 MRA 是美國操控的反共工具的《大公報》，¹²⁷ 對之亦作正面報導，肯定這項活動有利於扭轉「日趨敗壞」的社會風氣。¹²⁸ 《華僑日報》分別報導了潘頓與蔡貞人的講詞，說明 MRA 的理念與中國傳統道德不謀而合，強調中國的先哲理論如何放諸四海而皆準。¹²⁹

124 港府在戰後藉學校課程檢討及改革來加強「傳統文化主義」教育，當中關於政治管治的論述，參考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頁 184。

125 〈道德重整會議代表一七六人全不吸煙飲酒，四大信條與我國儒家教化大致相同，港代表蔡貞人自菲返港〉，《華僑日報》，1957 年 4 月 16 日。

〈世界道德重整運動、注意儒家修齊治平、港出席代表邵光返港談〉，《華僑日報》，1958 年 4 月 1 日，3 張 1 頁。

126 〈各街坊會禁毒徵文 名次經已評定公布 灣仔坊會重整道德徵文名次也揭曉〉，《大公報》，1961 年 2 月 6 日，頁 5。

127 金波廣，〈這算是什麼武器 剖視世界道德重整會〉，《大公報》，1957 年 9 月 15 日。

128 〈灣仔街坊福利會主辦「重整道德」徵文頒獎〉，《大公報》，1961 年 2 月 13 日，頁 5。

129 〈灣仔街坊會主辦道德重整徵文舉行頒獎典禮 由何艾齡博士主持頒獎〉，《華僑日報》，1961 年 2 月 13 日，2 張 4 頁。

MRA 香港分會也一直着力透過各種人脈網絡進入大、中、小學校，期能將 MRA 的宣傳單張、書籍等印刷品納入制度化的學校教育、滲進學生的思想世界，甚至是將道德重整的行事綱領與活動制度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指導學生的思想活動、改變他們的人生價值與文化體驗。該會於《華僑日報》刊登了一則推動道德重整運動的倡議，這也側面反映了該會開展運動的構想與行動方法：

- 一. 請各有關之道德宗教團體發動如下工作：1.分別定期發動「道德重整運動周」；2.相互去函聯絡討論工作進展方向。3.各宗教團體舉行「道德重整運動」祈禱。
- 二. 請各宗教各學校各社團為響應「道德重整運動」成立專案委員會，各專案委員會應由各機構負責人兼任，並聘請各所在地區之名流紳商為委員，以加強運動之工作效率。
- 三. 請各學校發動「道德重整運動周」之精神訓話，其講員可事前函請各宗教團體轉請著名學者教授出席擔任專題演講。
- 四. 請各社團發動「道德重整運動」有關之學術演講或討論會，其講員請事前函請各道德宗教團體商請學者專家擔任。
- 五. 請各宗教各學校各社團為響應「道德重整運動」所成立之專案委員會，定期派員互相訪問，以研討是否有成立「道德重整運動」聯合委員會之必要。
- 六. 各專案委員會主權獨立、經濟獨立、相互維持一個聯合機構，俾為經常發動之總樞紐，並為代表與國際道德(團)體聯絡之唯一合法機關。
- 七. 該聯合委員會，採行聯合國組織制度，輪流擔任主席並設各種專門委員會，印行一種定期刊物，經常舉行學術演講，並盡可能作

有關道德重整運動宣傳之種種活動。¹³⁰

上述期盼，最後獲得了多少宗教或教育機構響應，它們有沒有成立「道德重整運動周」，可惜目前暫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可供深入論述。不過，我們並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即它透過那些擁有號召力及辦學權力的成員們實踐有關理念，由此貫徹至各級學校的教育方案，影響青少年的文化體認與思想模式。準此，我們可以透過 MRA 的一本中譯本道德倫理教育書籍——《黑與白》的發行來觀察它的具體推動方式，進而看出它是如何獲得香港在地宗教及教育機構的響應。

香港聖公會主教白約翰(Gilbert Baker)致信教區轄下 23 所中學，要求將《黑與白》納進「宗教及道德教育」課程。它在 1975 年的銷售量超過了 14,500 本。這一成績深受「世界道德重整」大會重視，獲得《新世界新聞》以特寫新聞報導的形式介紹《黑與白》的譯者李文浩的貢獻與家庭故事，讓讀者了解到李毓田、李文浩兩父子在香港推動 MRA 工作的歷程。¹³¹

該報導還指出李文浩聯繫了 30 所中學，成功把《黑與白》納進學校的課程架構，為中學生學習之用。這標誌了 MRA 倡導的宗教道德倫理標準與價值體系，進入了香港教育體制，讓 MRA 的思想綱領在中學獲得了響應與實踐。¹³² 为了更好地推廣《黑與白》，並且將之有效地在學校推行，李文浩在 1975 年暑假與 MRA 香港協會成員舉辦了「研討會系列」——「創造大公無私的社會：《黑與白》研讀課程」，對象是學校校長及教師。據報，他們當年訓練了 56 名來自 29 所學校

130 〈道德團體呼籲各界展開道德重整運動〉，《華僑日報》，1961 年 4 月 16 日，2 張 3 頁。

131 “Report from David Bunton in Hong Kong,” *New World News for Moral Re-armament* 23:17 (22 February 1975): 1-2.

132 “Report from David Bunton in Hong Kong,” 1-2.

的教師代表(其中七名是校長)。

《黑與白》研讀課程針對香港的色情、賭博、毒品、貪污、暴力問題而召開，從《黑與白》擷取道德教育與靈性培育的方案，透過訓練教師代表，然後把 MRA 的道德教育理念傳授至所屬學校的師生。當 MRA 的讀物滲進學校的教育體制，得以直接向廣大師生灌輸其思想主張時，我們便可以說它的確是產生了在地的影響力。

五、東亞冷戰走向終結與香港道德重整運動的式微

MRA 第二任領袖霍華德，在 1962 年訪問香港時便曾向在機場迎接的胡素貞、張發奎表示，期待香港能建立成 MRA 在亞洲發展的重要中心(A key centre to establish MRA in Asia)；¹³³ 但香港最終未能如其所願般在往後成為領導亞洲運動的中心。不只是香港，MRA 在美國的大本營麥基諾島的事工也在 1960 年代後期逐漸走向下坡乃至式微。這與 MRA 兩位最核心的領導人相繼離世很有關係。布克曼於 1961 年去世，短短四年後的 1965 年，接班人霍華德也跟着逝世。MRA 的發展備受打擊。¹³⁴ 在霍華德逝世一年後，負責 MRA 財政的重要人物、美國銀行家 Gilbert McC. Harris 也於 1966 年 8 月逝世。三名至為重要的領袖相繼離世，對 MRA 在精神上、行政上及財務收入上均帶來極大影響；¹³⁵ 1967 年，從未公開財政收支的 MRA，是年收入據報驟減 350 萬美元。霍華德創辦的麥基諾學院(Mackinac College) 在 1966 年開辦後不足四年，便因財務收支及生源不足而於

¹³³ Don Simpson, *Katie Woo: Pioneer Education from Hong Kong*, 34.

¹³⁴ 陳紀滢，〈道德重整運動的今昔〉，《中央日報》，1982 年 8 月 1 日。

¹³⁵ “Gilbert McC. Harris Dies at 65; A Moral Rearmament Leader,” *The New York Times*, 21 August 1966.

1970年6月關閉。1970年代，道德重整運動每年大聚會、各合唱團世界大巡遊表演的盛況難再重現；再伴隨世界經濟衰退，歐美總部停止大規模聚會，大會也難如昔日般為各地參加者提供旅費補助。不只如此，美國總部也在1972年停止辦公，MRA劇院的戲劇與電影緊隨國際政治氣氛，影響力迅即衰退。¹³⁶

1971年年末，中國大陸取代臺灣成為聯合國成員，美國、日本於1972年開始與大陸的關係走向正常化，東亞的熱戰、冷戰俱歸平靜，MRA在東亞、在香港的發展基本上已經看不到意識形態鬥爭的政治色彩。《新世界新聞》在1970年代初期以來涉及反共的內容也越來越少，社會改造的課題諸如正視黃賭毒及暴力等社會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社會肅貪倡廉及青少年教育等問題則成為了新時代的關注焦點。1974年該刊涉及香港的報導，其中一則是香港聖公會主教白約翰向教區中小學推薦《黑與白》的報導，這已完全是社會文化教育性質的文稿，重點在於透過這本書獲得改善人際關係、增進互信和了解的方法。¹³⁷ 1975年發生在香港的英籍高級警官葛柏(Peter Godber)因貪污案，被引渡回港受審一事，也受到MRA香港協會乃至MRA世界大會的關注，並將之看作是香港經濟過於發展所引生的不良後果，由此強調MRA可以在道德思想層面幫助香港解決深層次的社會問題。¹³⁸

從香港的角度來觀察MRA所傳播的在地社會意義與思想資源，我們可以說它所建構的四大絕對道德標準，是沒有多少人會否定其積

¹³⁶ Richard H. Palmer, "Moral Re-Armament Drama: Right Wing Theatre in America," *Theatre Journal*, 173-174.

¹³⁷ *New World News for Moral Re-armament* 22:20 (9 March 1974).

¹³⁸ "Reports from David Bunton in Hong Kong", *New World News for Moral Re-armament*, 23:17 (22 February 1975).

極意義的。它們總體上合乎人心追求真與善的道德訴求。諸如赦免仇敵、愛人如己、自我悔罪等等的宗教精神被大書特書，這在多元觀念碰撞的年代，有助於打破宗教隔閡，消除種族歧視、化解國家之間的仇恨。在後冷戰時代，這些都合乎人心趨向。

不過，1970年代中後期以來，香港代表出席 MRA 活動的例子越來越少。偶然可見余兆麒出席大會的身影，但他把更多心力用於順道考察位於美國、日本的公司業務與商貿活動。¹³⁹ MRA 的國際交流平台因應時勢的轉變而在政治色彩上更加淡化，但參與者在這張交際網絡上，於商業與生意上的來往則沒有停止。自 1960 年代中後期以來，不少從美國及日本過境香港的 MRA 成員，他們的訪港活動除了與在港成員見面外，往往還會拜會香港的工商業界領袖洽談生意合作。香港 1960 年代以來的工業化改革及發展，是否也得益於 MRA 的美日政商成員的某些貢獻，這值得我們在另文探究。

1976 年，MRA 在香港的負責人，已很少有公開活動，¹⁴⁰ 除了《南華早報》偶爾報導晚年胡素貞、凌道揚追憶布克曼的文字外，沒有新的見報資訊。從 MRA 官方刊物中，還可以看到對李文浩的介紹，指他會定期與香港的社會專業人士諸如珠寶商、商人、校長及社會工作

139 〈中國聯合銀行總理余兆麒飛轉歐出席道德重整會〉，《華僑日報》，1970 年 8 月 15 日；〈世界道德重整會議余兆麒應邀飛瑞〉，《華僑日報》，1971 年 7 月 14 日；〈中國聯合銀行總理余兆麒考察歐美，出席瑞士道德重整會議〉，《華僑日報》，1973 年 8 月 12 日，3 張 1 頁。

140 根據胡素貞呈交警方社團事務處的名單，除了她本人外，負責人還有李毓田及李文浩父子、吳黃禮新、梁願宏等四人。全職在港為 MRA 工作的人員還有四名外籍人士：Mr. and Mrs. Donald B. F. Simpson, Miss Jean E. Simpson and Mr. David R. Bunton. Dr. F. C. Woo, M.B.E., JP to Registration of Societies, Royal Hong Kong Police Headquarters, 29 June, 1976，香港歷史檔案館 HKRS950-1-582。另見〈道德重整運動職員名單〉，1976 年 7 月 20 日，香港歷史檔案館 HKRS950-1-582。

者會面，推銷 MRA 的理念、推動青年教育、解決香港內部過於強調資本主義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¹⁴¹

1979 年，胡素貞逝世，張發奎在隨後的一年裡也離世。進入 1980 年代，香港分會的會址亦告取消，僅代以香港郵政信箱作為聯絡方法。直至今日，MRA 香港分會基本上已是處於冬眠狀態；甚或是銷聲匿跡。¹⁴²

總結上文可見，戰後美國於東亞戰略上，聯合日、臺而對中共採取各種防禦、圍堵的策略。在冷戰地緣政治危機下，作為美國文化冷戰武器的 MRA，在 1950 年代迎來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但是，當 MRA 在東亞與中美政治對抗的意識形態拉上關係時，則它的興衰也將隨着政局、時勢的發展，如影隨形地發展。

再從香港一隅觀察 MRA 的式微，我們至少可以將之總結為遭逢時局丕變、意識形態退場、經費短絀、人才凋零諸種因素；再加上 MRA 的工作對象或吸納重心較偏重於有知識、有專業背景的社會精英，但始終未能與香港的殖民地政府發生聯繫或得到更強大的制度化支持，致使其難在社會基層生根發展。當香港的一眾主事者或核心推手相繼離世，它也就無以為繼，難以轉型而逐漸瓦解。

¹⁴¹ “Reports from David Bunton in Hong Kong”, *New World News for Moral Re-armament* 23:17 (22 February 1975): 2.

¹⁴² 根據臺灣道德重整協會 2019 年的《年報》顯示，「香港道德重整友人」Bakie Chan 及梁小慧曾分別於 6 月 17 日至 21 日、12 月 24 日到訪該會。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108 年報》，<https://mra.org.tw/images/stories/news/month-message/work108.pdf>，擷取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六、結語

冷戰初期自我標榜為超級意識形態的 MRA，高調地自我宣揚為普世性的意識形態，致力於建構出一種可以為全人類共同接受的宗教與文化。¹⁴³ 政治與宗教於 MRA 而言，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一場政治化的宗教運動，同時也是宗教化的政治運動。這樣一種難以區分政教的運動，一度為美國的文化冷戰服務，成為美國其中一項被實施的心理戰術。MRA 的出現，異於其他文化冷戰的做法，它的目的是搶佔信仰與倫理的道德高地，使之擁有話語權去批判敵對政權以及凌駕該等政權的意識形態。

不難看到，MRA 在冷戰初期的高調反共，發展至 1960 年代中後期以來美國冷戰氛圍減退之下，更加着重結合起文化教育、道德倫理觀念，所着力宣揚的是一套社會建設的方案。MRA 在這個時候宣揚「新人建設新社會」的號召，具體化為關心各地的社會公益事務的實踐工作。然而，世界道德重整大會的這種政治意味漸為弱化的情形，跟香港本身沒有太大的關係。香港的政治向來都是獨特而微妙的，MRA 在香港的宗教與政治意味自始至終都不太明顯。

我們可以說，在英國殖民地政治化的監管策略下，MRA 較少公開政治活動，成員們也較少激烈的反共言論。它進入香港的文化語境時，被具體化為對孔孟儒學精神的實踐以至復興中國文化，並致力於推動社區秩序建設與公民素質教育，以較隱蔽的形式塑造殊異於共產主義的思想形態。同時，當它進入各大中小學，組織青年學生與世界各地青年進行各種文藝交流與思想訓練，以影響他們在人生價值、

¹⁴³ “Report on Asia: Significance of MRA in Asia,” *MRA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1:2 (1 March 1952): 4.

文化與生活模式為其目標。就這點而言，沒有政治色彩的 MRA 對於一大批具宗教背景在香港辦學團體而言，反過來也具備一定的吸引力，而它推動香港社會的道德教育工作，恰好合乎港府當局的利益。

於本文而言，MRA 在香港的身影既然絕非曇花一現，那麼，它的發展過程與人事網絡便尤有值得注意之處。畢竟，MRA 在香港自 1950 至 1970 年代的近三十年的活動足跡，正好讓我們可以了解好像 MRA 這樣一種政教糾纏的國際性運動的時代意義。特別是它在香港發展的興衰，讓我們多了一個不同的視角，觀察曾經活躍在香港的南來知識群體的在地參與及改造社會的嘗試，這對我們進深了解戰後香港的人際網絡、國際交流及社會發展等等的問題，相信都會有一定的裨益的。

(本文於 2022 年 6 月 15 日收稿；2023 年 6 月 15 日通過刊登)

*本論文是香港研究資助局撥款資助項目「道德重整運動在冷戰香港」(計畫編號 GRF-CityU.11608619)的部分成果。謹向該局致謝！同時，筆者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給予專業而中肯的寶貴修訂意見！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 檔案

英國外交部情報研究部檔案，*Record of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FO 1110/1581.

英國外交部檔案，*Record of Foreign Office*，FO 371/92223.

美國中央情報局檔案，"The U. S. Doctrinal Program, PSB D-33/2," *Memorandum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May 5, 1953. CIA-RDP80R01731R003200050006-0.

美國中央情報局檔案，*Foreign Reaction to the MRA Play the Vanishing Island*, 14 September, 1955, CIA-RDP78-02771R000300250002-7.

美國中央情報局檔案，*Deputies' Meeting*, 18 May, 1955, CIA-RDP80-B01676R0023001700128.

美國中央情報局檔案，*Letter to Mr. Allen W. Dulles from Charlotte Kelly*, 25 June, 1959, CIA-RDP80R01731 R000200050122-4.

美國中央情報局檔案，*Journal Office of Legislative Counsel Friday*, 1 February, 1952, CIA-RDP91-00682R000200070192-4.

美國中央情報局檔案，*Deputies' Meeting*, 15 June, 1959, CIA-RDP80B01676R002400060122-7.

美國中國事務處檔案，350.2 Third Force (1951).

美國中國事務處檔案，350.2 Third Force (1952).

美國白宮行動協調委員會檔案，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White House. CK2349092098.

美國國家安全局檔案，*NSC Report 6007 on U.S.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9 May, 1960, CK2349113632;

Archive of the Oxford Group,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MS Oxford Group 3/33.

- Archive of the Oxford Group*,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MS Oxford Group 3/139.
- The National Archive, *Records of the Security Service*, The Oxford Group: Moral Re-Armament Group, KV 5/ 67.
- The National Archive, *Records of the Security Service*, The Oxford Group: Moral Re-Armament Group, KV 5/ 68.
- The National Archive, *Records of the Security Service*, The Oxford Group: Moral Re-Armament Group, KV 5/ 69.
-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Moral Re-armament Records 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2011.
- Political-military contingency study of Hong Kong*, U.S. White House, 1967, CK2349110590.
- 香港歷史檔案館 · The Control of Publications Consolidation Ordinance, 1951 (The Newspapers Regis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Regulations 1951): *MRA Information Service*, HKRS1250-1-320.
- 香港歷史檔案館 · Moral Re-Armament, HKRS590-8-1672.
-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SS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aily Report,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1 August, 1969, No. 148,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A1.
- "Activities Oswald, Lee, post-Russian period, political and subversive..., Leads and information CIA," 28 January, 1978. *JFK Assassination System Identification From*, United State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 Record Number:180-10089-10407.

(二) 報紙

- 《香港工商日報》(香港) · 1952-1962
- 《工商晚報》(香港) · 1955-1967
- 《大公報》(香港) · 1950-1962
- 《中央日報》(臺北) · 1982
- 《華僑日報》(香港) · 1957-1973
-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1948-1966

Time, New York, 1935, 1936, 195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1962

(三) 刊物

- 〈道德重整會訪問本校〉，《新亞學生報》，25 (香港，1967年3月10日)。
- 明霜，〈擾攘世界中的空谷靈音——道德重整運動簡介〉，《中國學生周報》，275 (香港，1957年10月25日)。
- 余兆麒，〈道德重整與共產主義競賽〉，《春秋》，129 (香港，1962年11月)。
- 曾影翹，〈東遊日注〉，《新亞生活》，卷9至10 (香港，1966年10月至1967年6月)。
- Moral Re-armament. *You Can Defend America*. Washington, D. C.: Judd & Detweiler, Inc., 1941.
- “Report on Asia: Significance of MRA in Asia.” *MRA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1:2 (1 March 1952).
- “Change in a revolutionary age.” *MRA information service* 1:7 (10 May 1953): 25.
- “Security and the ideological.” *MRA information service* 1:7 (10 May 1953): 27.
- “News in Brief: In Hong Kong.” *MRA Information Service* 11:269 (9 June 1962).
- “Black and white, not red: a new line in China?” *New World News* 22:18 (23 February 1974).
- New World News* 22:20 (9 March 1974): 1.
- “Creating the New Society.” *New World News*, 22:22 (23 March 1974): 2-3.
- “Second Printing.” *New World News* 22:39 (20 July 1974).
- “Report from David Bunton in Hong Kong.” *New World News* 23:17 (22 February 1975): 1-2.
- “Chinese study handbook.” *New World News* 23:49 (4 October 1975): 3.
- “Taiwan conference.” *New World News* 24:46 (18 September 1976): 4.
- “A. Open Letter to Teng Hsiao-Ping.” *New World News* 27:15 (3 March 1979): 1.
- MRA House ed. *Postwar Japan and the Work of Moral Re-Armament. 40th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Tokyo: Asia Center Odawara, 2008, 47-55.
- 財団法人MRAハウス，《アジアセンターODAWARA 40周年記念——戦後の日本とMRAの軌跡》，東京：小田原亞洲中心，2003，頁21。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卜克滿(Frank Buchman)，《改造世界》，臺北：正中書局，1950。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2013。
- 何應欽，《世界道德重整運動與龍劇》，臺北：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1984。
- 何應欽，《何應欽將軍道德論叢》，臺北：世界道德重整運動中華民國聯誼會，1959。
- 何應欽，《何應欽將軍講詞選輯》，臺北：臺北何氏宗親會，1984。
- 吳醒濂，《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書局，1937。
- 李毓田，《到光明之路》，香港：亞洲出版社，1955。
- 李潔明(James Roderick Lilly)，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2003。
- 汪浩，《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 1949-1958》，臺北：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 周愛靈，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 林博文，〈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興亡始末〉，《歷史的暗流——近代中美關係祕辛》，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9。
- 胡志偉，〈「自由中國抵抗運動」的開場與收場〉，《傳記文學》，93:6(臺北，2018年12月)，頁43-57。
-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
- 高馬可(John M. Carroll)，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
- 高擘，《留日知識分子對日本音樂理念的攝取——明治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
- 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回憶錄》，臺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7。
- 張楊，《冷戰與學術：美國的中國學 1949-19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 陳正茂編著，《50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秘》，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
- 陳紀滢，《在柯峯》，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62。
- 陸延，《異途相逢：勞工運動與香港殖民統治 1938-1958》，香港：中華書局，2022。
- 麥志坤，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2018。
-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不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 資中筠，《資中筠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 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 Cook, Sidney. Lean, Garth, 李文浩譯，〈新人建設新社會〉，《黑與白》，香港：道德重整會，1974。
-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 Keith, Jim. *Mind Control, World Control*. Illinois: Adventures Unlimited Press, 1997.
- Memorandum from J. M. Schwarz to Dr. H.S. Craig reaction to the world tour of moral rearmament's (MRA) play.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White House. 30 Aug, 1955.
- Mentan, Tatab. *Africa in the Colonial Ages of Empire: Slavery, Capitalism, Racism, Colonialism, Decolonization, Independence as Recolonization, and Beyond*. Cameroon: Langaa RPCIG, 2018.
- Simpson, Don. *Katie Woo: pioneer educator from Hong Kong*. Australia, Victoria: Katie Woo Memorial Trust Fund, 1997.
- Howard, Peter. *An Idea to win the world*, London: Blandford Press, 1955.

(二) 論文

- 于群，〈社會科學研究與美國心理冷戰戰略——以「學說宣傳項目」為核心的探討〉，《美國研究》(北京，2007.2)，頁 68-83。
-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1(臺北，2020.3)，頁 123-158。

- 史澎湃、王成軍，〈從心理戰略委員會到行動協調委員會——冷戰初期美國心理戰領導機構的歷史考察〉，《陝西師範大學學報》，39:5 (陝西，2010.9)，頁 91-98。
- 張楊，〈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22:2 (北京，2015.3)，頁 91-102；
- 陳正茂，《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冷戰時代滯港及流亡海外的第三勢力滄桑錄》，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21。
- 陳學然，〈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臺大歷史學報》，70 (臺北，2022.12)，頁 167-244
- 陳學然、張志翔，〈冷戰時期香港「教育條例」修訂與私立專上院校發展(1948-1958)〉，《思與言》，57:4 (臺北，2019.12)，頁 135-198。
- 陳學然、張志翔，〈文化冷戰與「道德重整運動」的意識形態整合(1948-1979)〉，《南國學術》，13:2 (澳門，2023. 4)，頁 270-293。
-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 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173 (香港，2019.6)，頁 48-56。
-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 1950-1970(下)〉，《二十一世紀》，174 (香港，2019.8)，頁 67-82。
- 蔡俊威、李家翹，〈政治的法律化：冷戰時期香港的地緣政治處境及其法治的鞏固〉，《思與言》，55:2(臺北，2017.6)，頁 187-225。
- 劉家峰，〈向邊疆進發：中華國內布道會初探〉，《晉陽學刊》，1 (太原，2012)，頁 86-93。
- Laugesen, Amanda. "American Publishers, Books, and the Global Cultural Cold War: Alfred A. Knopf Inc.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53-1970."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5:2 (December 2016): 19-37.
- Palmer, Richard H.. "Moral Re-Armament Drama: Right Wing Theatre in America." *Theatre Journal*. 32:2 (May, 1979): 173-174.

三、網路資料

一般財団法人 MRA ハウス，<https://www.mrafoundation.or.jp/2.html>，擷取日期：2021 年 10 月 5 日

- 公益社団法人国際 IC 日本協会，<http://iofc.jp/>，擷取日期：2021 年 10 月 5 日。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官方網頁，<https://mra.org.tw/>，擷取日期：2021 年 10 月 5 日。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108 年報》，
<https://mra.org.tw/images/stories/news/month-message/work108.pdf>，擷取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https://www.dcfwms.edu.hk/>，擷取日期：2023 年 7 月 7 日。
- 胡惠德資料介紹，<https://rotary3450.org/wp-content/uploads/2019/12/Dr.-Arthur-W.-Woo-Rejuvenated-the-broken-Hong-Kong-Rotary-Club-in-1945.pdf?x60082>，擷取日期：2021 年 9 月 5 日。
- Initiatives of Change. <https://iofc.org/en>. Accessed June 14, 2022.
-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Library. “Government Documents - Intelligence Agencie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https://guides.library.manoa.hawaii.edu/c.php?g=105339&p=686901>. Accessed February 1, 2023.
- For a New World. “Anything to Declare (ATD) in Hong Kong.”
<https://www.foranewworld.info/material/films/anything-declare-atd-hong-kong>. Accessed February 1, 2023.
-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44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9/d334>. Accessed December 16, 2021.

Cultural Cold War: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Re-Armament in Hong Kong

Hok-yin Ch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US), the Moral Re-Armament (MRA) movement swept across the globe. Due to the reach of American influence, it attracted many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vement. Hong Kong, much like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 such as Japan and Taiwan, had its own cohort of MRA adherents. However, in contrast to Japan and Taiwan, the participants in Hong Kong were predominantly drawn from the education sector, third forces and students from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rather than political or business leaders. Notably, the governance policy of the British-Hong Kong government remained politically neutral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Consequently, the MRA saw limited engagement from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men, resulting in its relatively subdued reception compared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Examining the modest footprint of the MRA in post-war Hong Kong offers us in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movement's global successes and milestones. It also sheds light on how supporters sought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hat which blended religious ideals alongside political awareness. Furthermore, this perspective offers a fresh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civil society in Cold War-era Hong Kong, showcasing its informal interactions and network-building endeavors with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Keywords: Moral Re-Armament (MRA), Cultural Cold War, Hong Kong, The Third Force, Li Yutian, Zhang Fakui